

美國法上懲罰性賠償金 數額分享制度之研究^{*}

戴志傑^{**}

要目

- | | |
|-------------------------|-------------------------|
| 壹、前言 | 二、否定論說 |
| 貳、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
政策論爭 | (一)激起賠償金失控與更多訴訟紛爭 |
| 一、肯定論說 | (二)誘引法官們違反應有的職業倫理 |
| (一)降低原告獲取意外之財之疑慮 | (三)惡化原告與其律師間之利益衝突 |
| (二)增加和解機會並減少訴訟紛爭 | (四)增強政府涉入或強索私人之財產 |
| (三)落實公益性格而實現社會利益 | 參、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
規範內容 |
| (四)籌措政府財源以充實國庫稅收 | 一、現仍實施數額分享制度的州 |

DOI : 10.3966/102398202015030140005

^{*} 本文為國科會101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懲罰性賠償金作為消費者保護基金之經費來源的可行性研究——以美國《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之實踐經驗為鑑（NSC 101-2410-H-126-004）」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稿已發表在靜宜大學法律學系2012年5月所主辦的《民事損害賠償法制——民法暨其特別法上之規範與實踐(二)》學術研討會。後學須特別感謝研討會主持人曾品傑教授、與談人洪令家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稿委員對本文提供寶貴意見，並細心斧正相關未周之處，惟文責仍由後學自負。

^{**} 靜宜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博士。

投稿日期：一〇二年十月五日；接受刊登日期：一〇三年二月二十日

責任校對：黃甯

(一)以法令方式制定	(二)若干法院的判決意見
(二)以判決方式實踐	伍、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發展動向
二、曾經實施數額分享制度的州	一、若干論者的改革與修正建議
(一)以落日條款廢止	(一)該賠償金制度目的的再概念化
(二)以判決方式廢除	(二)排除原告涉入該賠償金之訴訟
肆、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司法審查	(三)治癒性賠償金制度概念之替代
一、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之徵收條款	二、聯邦最高法院Philip Morris案後的評述
(一)違憲爭議的審查重點	(一)本案事實及判決重點
(二)若干法院的判決意見	(二)本案判決對數額分享制度之影響
二、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之平等保護條款	陸、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綜合評述——代結論
(一)違憲爭議的審查重點	一、公共政策之評估
(二)若干法院的判決意見	二、規範內容之比較
三、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之過度罰金條款	三、違憲疑慮之解決
(一)違憲爭議的審查重點	四、發展動向之觀察

摘 要

近年來黑心產品致害事件頻傳，故消基會即提出「消費者保護基金」草案，明訂該基金創設上之法源依據及其目的，並規範該基金之經費來源。然儘管該草案立意甚佳，但細究其內容仍有諸多疑慮與商榷之處。是故，因現今美國法上已有若干州施行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而實踐如同上開基金之目的，從而本文即研究該國此等數額分享制度，其中包括該制度之公共政策及其實踐疑慮，以及其已涉合憲性爭議的相關判決，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於二〇〇七年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乙案判決後，論者間對該制度存廢與修正上所提出的相關意見。最後，希冀以該國此等制度之實踐經驗為鑑而供我國未來立法上之參考。

關鍵詞：填補性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消費者保護基金、徵收條款、平等保護條款、過度罰金條款、正當法律程序條款

壹、前言

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當前意義係指，民事陪審團或事實審理者基於懲罰被告主觀上具可責心理狀態且為社會無法容忍的不法行為，與嚇阻其與他人不再於未來從事相類似不法行為等目的，而在其自身裁量權之範圍內，另行於填補性賠償金以外裁決一筆金錢數額的一種普通法上民事賠償制度也¹。是故，在該國通說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為懲罰與嚇阻等目的之情形下，關於其數額之估算通常即按具體個案之情狀而斟酌各種考量因素以做出最適化的裁決金額²。從而，在考慮到諸如被告不法行為之可非難性、可獲利性、損害程度以及其財務狀況等重要因素後，即有可能裁決出一筆適當但卻屬驚人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且相對地，當慣例上均將該賠償金支付給原告時，則其因而獲得高額的該賠償金即屬難免之事。然因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之估算具有其內在的高度不確定性，以致使社會大眾對原告因該賠償金訴訟而轉眼間成為億萬富翁等情形感到憂慮與不安³；且又因大型企業提出各種避重就輕的研究報告以及大眾傳播媒體製作渲染性的新聞報導，而造成整體社會蔓延著

¹ 關於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意義及其目的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戴志傑，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基礎問題研究，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15-25、55-81，2007年7月。此外，其他重要的中文資料，請參閱林德瑞，論懲罰性賠償，中正法學集刊，1期，頁25-66，1998年7月；謝哲勝，懲罰性賠償，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30卷1期，頁113-161，2001年1月；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31卷5期，頁163-219，2002年9月。

² 根據學者對於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各州法令之研究，關於該賠償金數額總計有15種估算因素可供參考。請參閱戴志傑，同前註，頁432-433。

³ Victor E. Schwartz, Mark A. Behrens & Cary Silverman, *I'll Take That: Legal and Public Policy Problems Raised by Statutes That Require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to be Shared with the State*, 68 MO. L. REV. 525, 534 (2003).

訴訟樂透 (litigation lottery) 與保險危機 (insurance crisis) 的氣氛⁴，如此便促使論者們紛紛提出相關的改革建議方案，且各州政府亦藉此而進行侵權行為法的改革活動，以試圖解決該賠償金制度運作下所生數額估算之問題⁵，而其中最受關注的重點之一即是：究應如何解決原告如獲訴訟樂透般意外之財 (windfall) 的疑慮⁶。

對此，即有論者們提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 (split-recovery systems)⁷之概念，亦即將該賠償金裁決額予以分配，並要求其中份額應支付至州政府一般基金 (general fund) 或其所設立的特定基金 (specific fund)，以減少原告獲得鉅額該賠償金的可能性⁸。於是，在近年該國侵權行為法的改革浪潮中，即有若干州

⁴ See generally Michael L. Rustad, *Access to Justice: Can Business Co-Exist with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 The Closing of Punitive Damages' Iron Cage*, 38 LOY. L.A. L. REV. 1297, 1297 (2005); Victor E. Schwartz & Mark A. Behrens, *Punitive Damages Reform—State Legislatures Can and Should Meet the Challenge Issu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alsif*, 42 AM. U. L. REV. 1365, 1370-72 (1993).

⁵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立法改革方案，主要係採取該賠償金的最高限額 (caps) 與數額分享等方式。See generally Victor E. Schwartz, Mark A. Behrens & Joseph P. Mastro Simone, *Reining in Punitive Damages "Run Wild": Proposals for Reform by Courts and Legislatures*, 65 BROOK. L. REV. 1003, 1003 (1999).

⁶ JOHN J. KIRCHER & CHRISTINE M. WISEMAN, *PUNITIVE DAMAGES: LAW AND PRACTICE* § 21:17, at 85 (2d ed. 2000).

⁷ 此種制度所頒布的法令於美國法上一般均稱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 (Split-recovery Statute)，但亦有稱為州政府分享法令 (State-sharing Statute) 或懲罰性賠償金分配法令 (Punitive Damages Allocation Statute)。

⁸ See, e.g., E. Jeffrey Grube, *Punitive Damages: A Misplaced Remedy*, 66 S. CAL. L. REV. 839, 845-55 (1993); Leo M. Stepanian II, *The Feasibility of Full State Extrac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32 DUQ. L. REV. 301, 327-28 (1994); David G. Owen,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in Product Liability Litigation: Strong Medicine or Poison Pill?: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藉此機會而曾經或現仍以法令制頒或判決宣示等方式實施各自規範內容的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然因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的此種作法畢竟係為該賠償金制度法史之創舉，且又因此種作法本身仍具高度的政策論爭，輔以各州在相異的規範內容實踐下亦有衍生出聯邦憲法相關條款之疑慮，故即使得此種既可解決原告獲取意外之財又能增進社會公益的直覺式訴求方案——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在提出與實踐的過程中每每遭受到高度且強烈的批評以及合憲性方面的爭議，且縱然期間已有論者們對此等數額分享制度提出各種修正或替代方案，亦復如是。此外，當聯邦最高法院於二〇〇七年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⁹案做出禁止第三人損害（third-party harms）作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估算因素的此種判決意見後¹⁰，又使得此等數額分享制度的正當性問題再次受到關注並引發論爭。

是故，儘管我國消保法上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已採取三倍最高限額的立法模式而似乎不致於發生如同美國法上一般的鉅額該賠償金現象¹¹，但畢竟立於傳統民事損害填補之角度以言，此種超填補

39 VILL. L. REV. 363, 410 (1994).

⁹ 127 S. Ct. 1057 (2007).

¹⁰ See *Philip Morris*, 127 S. Ct. at 1067.

¹¹ 懲罰性賠償金最高限額的立法改革，儘管係最受各州立法機關所歡迎，但卻是多數學者們最為批評的模式。不過，無論如何，各州在制定此種法令時均有一併制定除外條款的配套措施以為因應；且按國內學者的研究可知，現今此些除外條款共計具有16種類型，且主要包括有團體訴訟（class action）、不當致死訴訟（wrongful death action）、故意施加人身損害（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physical injury）以及產品責任（product liability）。請參閱戴志傑，同註1，頁448-466。是故，儘管此種最高限額的立法改革並非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但從美國各州法令中即可初步瞭解到我國現行的此種倍數立法可謂是非常的粗糙而有進一步修法之必要。

性的 (supracompensatory) 懲罰性賠償金，其部分數額某程度亦可謂是原告的意外之財也¹²，且當我國現今制定《消費者保護基金》以維護大量受害消費者權益在即之際，能否將該賠償金數額的其中部分作為該基金的經費來源之一，以充實其財務狀況並因而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即是值得深入研究之課題¹³。因此，本文即以美國法上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為研究主題，其中先行探討該制度的政策論爭以瞭解其利弊得失；之後全面研究各州此等制度下之法令規範內容及其已涉聯邦憲法條款疑慮之判決，以分析其彼此間之差異性及其爭議所在；最後則彙整出此等制度的若干重要改革與修正建議及其相應的反對論說，且亦特別針對Philip Morris乙案判決後，論者們對此制度的存廢意見予以研究以分析其未來動向。執此，希冀在完整研究美國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規範內容及其發展後，得以之作為本文及立法機關日後關於《消費者保護基金》立法研究上之參考資料。

¹² 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鼓勵私人執行法律 (law enforcement) 以及填補無形損害與相關訴訟費用等實踐效力，故當該賠償金數額在扣除此些金錢誘因機制下所應給予的份額後，剩餘部分或許即可謂是原告的意外之財而得進一步地思考將之予以分享也。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實踐效力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戴志傑，同註1，頁81-98。

¹³ 近年來我國陸續爆發諸如三聚氰胺毒奶粉、塑化劑等大規模消費者致害事件，故消基會即於2011年10月提出僅3個月研擬下的《消費者保護基金草案》而試圖於消保法中增訂之。然儘管此立法之良善且亦可凸顯該基金立法之急迫與必要，但細究該草案的基金經費來源主要為「不法利益返還金」、「徵收金」以及「政府提撥金」，而未見有如同美國法上般的懲罰性賠償金分享金在內。是故，在此背景下即觸發本文研究之動機，並希冀透過美國法上此等數額分享制度之全面性研究以作為我國消保基金未來立法時之參考。因此，囿於研究範圍及其篇幅，本文僅就美國法的部分予以研究，至於我國《消費者保護基金》立法建議的提出則待日後續行為之。

貳、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政策論爭

儘管此種直覺式認為既可解決原告獲取意外之財又能增進社會公益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對於該賠償金數額的改革上確實具有其獨特的吸引力及其相關的公共政策理由，但因此種作法畢竟係為該賠償金法制史上之創舉¹⁴；且此種作法本身又具有其內在缺陷而可能無法達成所預設之目的，並可能侵蝕該賠償金制度上的實踐效力；輔以其實踐之過程中亦有可能衍生出若干負面之影響而增加其合憲性方面爭議的訴訟，故使得此等數額分享制度在提出之際與實踐過程中即伴隨著許多批評與反對聲浪。是故，以下即就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正反意見加以分析以瞭解此等制度於政策上的利弊得失。

一、肯定論說

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政策理由方面，肯定論者大多均以解決原告如獲訴訟樂透般意外之財之疑慮作為其主要論點，並認為當施行數額分享制度後，將可增加當事人間的和解意願並因而能夠減少訴訟紛爭；且亦指出，若該賠償金裁決額的其中部分能夠分配給州政府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公益基金時，除了得以落實該賠償金制度的公益性格而實現社會利益外，尚且能夠進一步地充實州政府的國庫稅收或減少其預算上的支出。是故，肯定論者即在此等主要目的與附隨價值等政策下支持著此種數額分享制度的作法。對此，詳述如下：

(一)降低原告獲取意外之財之疑慮

由於通說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目的係為懲罰與嚇阻，故其

¹⁴ KIRCHER & WISEMAN, *supra* note 6, § 21:17, at 87.

所關切的重點即應在於究竟須對該不法行為人裁決多少的該賠償金數額，方才能夠達成使其得不償失並因而建立典範的實效。因此，儘管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基於鼓勵私人執行法律的實踐效力而在慣例上將該賠償金裁決額均歸於原告，但嚴格言之，被告在系爭案中所被課予的該賠償金裁決額究應歸於何處，實屬該賠償金制度規劃上的次要問題¹⁵。其次，因民事損害賠償制度傳統上係以填補受害人之損害為主要，故當原告的損害在經由填補性賠償金判決而加以完全填補後，倘又能獲取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者，則使原告儼然如同得到樂透彩券般的意外之財。此點，早在一九六七年 *Roginsky v. Richardson-Merrell, Inc.*¹⁶ 乙案的判決中即有說到：「原告已經由填補性賠償金而對於其損害部分受到完全的填補。故允許原告保有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時，將是提供該原告一個『意外之財』」¹⁷。因此，立於原告損害已受完全填補的角度以言，即不應使已獲填補性賠償金的原告再去取得任何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¹⁸。從而，倘被告所被課予的懲罰性賠償金「全部裁決額」不再歸於原告且將之支付給州政府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公益基金時，除將可完全地杜絕原告獲取意外之財的疑慮外，尚亦能夠不影響該賠償金制度在懲罰

¹⁵ 蓋懲罰性賠償金乃是基於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且非係為受害原告們的利益而被裁決，因此其關注之重點乃是在於被告是否有為其不法行為付出代價而失去金錢，並非係在處理受害原告間是否有全部共享該筆金錢之問題。從而，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目的下，究竟是誰能夠得到該賠償金數額即成爲一種次要的問題。Howard A. Denmark, *Seeking Greater Fairness When Awarding Multiple Plaintiffs Punitive Damages for a Single Act by a Defendant*, 63 OHIO ST. L.J. 931, 958-59, 964 (2002).

¹⁶ 378 F.2d 832 (2d Cir. 1967).

¹⁷ *Roginsky*, 378 F.2d at 841.

¹⁸ Bethany Rab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plit-Recovery Punitive Damage Statutes: Good Policy but Bad Law*, 2008 UTAH L. REV. 333, 333 (2008).

與嚇阻不法行為人方面的重要目的¹⁹。是故，肯定論者即基於上述理由而認為此種剝奪原告獲得意外之財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是存有其立法上的正當性。

然而，儘管如此，但此種欲將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予以「全部分享」的制度構想，亦也受到肯定論的同僚們所批評。例如Owen教授即有指出，因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首要職責應係在使社會大眾獲得該賠償金數額利益之前，即先能夠使原告於該民事訴訟中實現損失真正填補與應報等兩方面的公平正義，故而其認為當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係屬相對適度時，則原告對該賠償金的「全部裁決額」即應具有一種優先且專有的權利而不應受到分配²⁰。換言之，當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係非為過度但確屬鉅額時，則該賠償金裁決額的其中部分或許即存有意外之財的本質而應受到分配，如此將不但能夠降低原告獲取「真正」意外之財的疑慮外，尚且得以兼顧到該賠償金制度在鼓勵執行法律等實踐效力方面的正常運作。是故，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對於涉及到係為適度但確屬鉅額的該賠償金案件時，即具有其政策上的重要意義。

(二)增加和解機會並減少訴訟紛爭

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慣例上係將該賠償金裁決額歸於勝訴原告，而使其在填補性賠償金之外又能夠另行取得一筆有時甚為豐厚的金錢數額，因此即形成該賠償金制度具有提供受害人勇於訴訟的金錢誘因機制，進而產生鼓勵私人執行法律的實踐效力。然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此等實踐效力亦相對容易地造成當事人間和解意願降低以及訴訟案件量增加等方面的負面結果。因此，當懲罰性賠

¹⁹ See Stepanian II, *supra* note 8, at 325-27.

²⁰ See Owen, *supra* note 8, at 410-11.

償金裁決額的其中部分被分配給州政府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公益基金以減少原告實際獲得的該賠償金數額時，無疑地將可降低該賠償金制度於實踐上所生過度金錢誘因的負面效應，從而能夠增加當事人間的和解意願並因此得以減少訴訟的案件數量²¹。例如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於一九九二年 *Gordon v. State*²² 乙案的判決中即有說到：「此種法令制定的其中目的之一即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懲罰性賠償金訴訟的請求」²³。是故，當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具有減少該賠償金制度之過度金錢誘因的實際效果時，毋寧亦將能夠促進當事人間的和解意願並進而減少不必要的訴訟紛爭，從而不但得以避免訴訟資源的浪費，且尚能夠解決責任保險成本逐漸高漲的衍生問題²⁴。因此，此種減少懲罰性賠償金過度金錢誘因機制的數額分享制度，即具有其立法上的正當性。

(三) 落實公益性格而實現社會利益

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為懲罰與嚇阻具有可責性內涵的反社會行為，故其實踐上即衍生出維持社會秩序並建立社會共同行為準則的反射效力，如此即使該賠償金制度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性格²⁵；且又因通說均已認為該賠償金制度乃係一種介於民刑間的準刑事上的（quasi-criminal）性質²⁶，故當該賠償金制度係為準公共的（quasi-public）特質時，則其規範技術上即理應由社會大眾來共

21 See Stepanian II, *supra* note 8, at 325-27.

22 608 So. 2d 800 (Fla. 1992).

23 *Gordon*, 608 So. 2d at 802.

24 See, e.g., *Smith v. Dep't of Ins.*, 507 So. 2d 1080, 1084 (Fla. 1987).

25 Rabe, *supra* note 18, at 333

26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性質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戴志傑，同註1，頁26-41。

享該賠償金制度所帶來的利益²⁷。再者，因被告所被課予懲罰性賠償金的該不法行為乃係傷害到社會的相關利益，故規範邏輯上必然應須使共同社會可從該賠償金裁決額之中獲得利益。從而，此種將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充作相關公益基金之經費並專用以彌補該不法行為所傷害的相關利益的數額分享制度，即屬具有正當性的立法²⁸。此外，州政府對於此種傷害到社會利益而理應由全體社會所共享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係比原告處於更優勢的位置而較能夠有效率的統籌運用該筆金錢²⁹。是故，此種將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分配給州政府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公益基金的數額分享制度，不但是符合該賠償金制度的公益性格，且方才能夠落實該賠償金制度在增益社會利益方面的重要目的³⁰，因而更具有其實踐上的效率性存在。

(四)籌措政府財源以充實國庫稅收

當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被以準公共性質為由而認為應使社會全體共享該賠償金之利益，且進而被要求應逕予分配以專用於社會利益方面支出的經費來源時，將相對地使州政府能夠因此而積極地增加稅收或消極地減少預算支出。換言之，立於充實州政府財源以使受

²⁷ Owen, *supra* note 8, at 410-11.

²⁸ 1 LINDA L. SCHLUETER, PUNITIVE DAMAGES 73 (5th ed. 2005).

²⁹ Rabe, *supra* note 18, at 342.

³⁰ 有論者指出，以立法方式制定法令倍數賠償金 (statutory multiple damages) 的此種模式，將可提供立法者明確地表達該賠償金係為諸如增加小額索賠 (small claims) 提訴誘因的非應報目的 (non-retributive goals) 的機會。從而，該論者認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的制定，將能夠提供立法者對於特定案件中的此種超填補性賠償金 (supracompensatory damages) 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去確立其非應報目的的立法機會。Catherine M. Sharkey, *Federal Incursions and State Defiance: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Wake of Philip Morris v. Williams*, 46 WILLAMETTE L. REV. 449, 471 (2010).

害的社會利益能夠獲得彌補的角度以言，此種經由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來籌措專用以社會公益支出經費來源的作法，即具有其立法上的必要性。例如喬治亞州聯邦地區法院於一九九〇年 *McBride v. Gen. Motors Corp.*³¹ 乙案的判決中即明確表示：「該數額分享法令的其中目的乃係為該州政府產生稅收上的利益」³²。然儘管如此，但在採取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的州裡，大多數於立法當時均不敢堂而皇之地提及此種目的，以避免遭受強徵稅款言說的政治道德非難³³。不過，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於理論上確實能夠達成政府充實稅收的此種可能性下，即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州的確係受到此種目的的鬼魅牽引而制定出各自的數額分享法令；且此種法令的制定似乎亦是相當程度地受到政治上所歡迎，蓋此種懲罰性賠償金的稅收將很可能係由州外被告來加以支付的³⁴，

³¹ 737 F. Supp. 1563 (M.D. Ga. 1990).

³² *McBride*, 737 F. Supp. at 1568.

³³ 除了於數額分享法令當中同時訂下落日條款的若干州之外，大多州均無提及政府稅收的此種目的。例如加州的數額分享法令乃係在其州長 Arnold Schwarzenegger 為實現競選承諾以解決嚴重赤字預算之目的下而所加以制定的，故其前言即明確指出：「非常且緊迫的預算需求而迫使此種異常措施的制定」。Cal. Civ. Code § 3294.5(a), effective August 16, 2004, Stats 2004 ch 227 § 8.5 (SB 1102), repealed July 1, 2006. 故加州即成為少數於其法令之中明文該數額分享制度係專為政府稅收之目的的州。See Leah R. Mervine, *Bridging the "Philosophical Void" in Punitive Damages: Empowering Plaintiffs and Society Through Curative Damages*, 54 BUFFALO L. REV. 1587, 1607 (2007).

³⁴ 有論者從實證研究中發現，黨派性格強烈的當選法官們具有一種動機因素去從州外被告身上分配財富給州內的原告。See Eric Hellend & Alexander Tabarrok, *The Effect of Electoral Institutions on Tort Awards*, 4 AM. L. & ECON. REV. 341, 368 (2002). 此外，亦有論者的實證研究中指出，當被告係為州外企業時，該民事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通常均是較高的，尤其是實施法官選舉制度的那些州裡。See Alexander Tabarrok & Eric Hellend, *Court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ort Awards*, 42 J.L. & ECON. 157, 186-87 (1999).

或至少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減輕該州人民納稅的負擔³⁵。是故，基於充實政府稅收之目的而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時³⁶，不但可使該賠償金成為州政府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公益基金的經費來源管道，且若專用以社會利益方面的支出時，不啻將可進一步地擴大該社會公益事務的實現可能性。

二、否定論說

儘管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肯定論者已有提出上述所云的堅強論據，而姑且不論此種數額分享制度所可能引起的憲法爭議問題³⁷，在關於該數額分享制度本身的目的性及其可行性方面上，即受到反對論者的強烈批評並直指，此種數額分享的作法僅是一種理論上貌似有理但實際上卻是無法達成所設目的，且反倒可能侵蝕該賠償金制度之原本並浪費更多司法資源的一種不良制度而已；且認為更為嚴重的是，此等數額分享制度將甚而產生道德價值與職業倫理方面的負面效應³⁸。是故，反對論者即在以下所述的主要論點中否定著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實踐價值。對此，詳述如下：

³⁵ Rabe, *supra* note 18, at 333.

³⁶ 在籌措州政府稅收的此等目的下所實施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將使得該賠償金的公法性格（public-law nature）增強，且提高政府涉入（government involvement）的程度，如此勢必引起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過度罰金條款（Excessive Fines Clause）方面的疑慮而成爲該制度下所必須解決的難題。Owen, *supra* note 8, at 410 n.164. See also James D. Ghiardi, *Punitive Damages: State Extraction Practice is Subject to Eighth Amendment Limitations*, 26 TORT & INS. L.J. 119, 130-31 (1990).

³⁷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所已涉聯邦憲法條款方面之爭議，請參本文後述內容。

³⁸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38.

(一) 激起賠償金失控與更多訴訟紛爭

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主要目的係為了解決原告獲取訴訟樂透般意外之財的問題，且希冀從中能夠增加當事人間的和解意願以減少訴訟上的紛爭，並進而得以達成司法資源節省的目的。然此等數額分享制度的實踐結果極可能是非如所願的，並甚而將進一步地造成該賠償金裁決額的失控；且當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比例的規劃不當時，亦可能導致原告獲得更多的意外之財。蓋在無數額分享制度的情形下，陪審團於估算該賠償金裁決額時，通常均會對於原告獲得鉅額的該賠償金一事感到憂慮與不安，並自動地做出較為緩和的裁決額。然在數額分享制度之下，當陪審團瞭解到本案該賠償金裁決額的其中部分將非屬於原告且須使用在社會公益時，其將不再憂慮於原告可能獲取意外之財的問題，且甚而更有勇氣裁決出比現今更高的該賠償金數額³⁹。此外，當本案被告係為州外的大型企業時，此種情形將顯得更加地嚴重，蓋陪審團極可能基於實現該州特定社會利益之天性，或本於平衡州政府預算以減輕自身納稅負擔的私利，而將州外被告充作該州政府國庫的贊助者，並最後做出不正確的該賠償金責任判斷或膨脹該賠償金的裁決額⁴⁰。是故，此種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無異將逐漸地改變陪審團在該賠償金制度運作下原有的自動緩和態度，且亦大幅度地增加陪審團偏袒原告的可能性，並從而提高其裁決過度性數額的風險⁴¹。

而上述此些負面效應可從已制定數額分享法令的若干州的法院判決意見中得到例證，且此些判決均認為，倘若該州懲罰性賠償金

³⁹ *Id.*

⁴⁰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1;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45.

⁴¹ Rabe, *id.* at 351.

數額分享法令的規定於陪審團指示事項中有被初審法官告知⁴²，或者是在總結辯論（closing argument）期間有被律師提及的話⁴³，均將是構成可撤銷判決的錯誤（reversible error）之事由而須命該案重新審理。例如在第一起處理此爭點問題的奧勒岡州最高法院一九九〇年Honeywell v. Sterling Furniture Co.⁴⁴乙案中，該法院的判決即說到：「在陪審團指示事項中告知『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其中部分將被支付給原告律師或捐助給諸如犯罪被害人援助等有價值的社會事業』時，並無法促進或實際告知陪審團有關於該賠償金裁決上的真正目的。反而，此種指示事項將分散陪審團對於該賠償金目的的分析的適當方向」⁴⁵，從而該法院最後判決此種陪審團指示事項乃係一種可撤銷判決的錯誤並命該案重新審理。是故，當陪審團指示事項中或總結辯論期間有使陪審團知曉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之規定，且因此將使該案最後構成可撤銷的錯誤而須重新審理的話，則無異是明確地承認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定將引起陪審團產生偏見或偏袒，並最終影響該賠償金裁決額的正確性⁴⁶。

此外，反對論者亦認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是無法達成其欲增加當事人間和解與減少訴訟紛爭並節省訴訟資源等方面的目的。蓋誠如上述，當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而將可能擴大該賠償金之責任成立及其數額裁量的失控時，則亦當然因此而將增加受害人及其律師提起訴訟的金錢誘因，以及被告對該賠償金裁決

⁴² See *Burke v. Deere & Co.*, 6 F.3d 497, 512 (8th Cir. 1993); *Ford v. Uniroyal Goodrich Tire Co.*, 476 S.E.2d 565, 570 (Ga. 1996); *Honeywell v. Sterling Furniture Co.*, 797 P.2d 1019, 1022 (Or. 1990).

⁴³ See *Burke*, 6 F.3d at 513.

⁴⁴ 797 P.2d 1019 (Or. 1990).

⁴⁵ *Honeywell*, 797 P.2d at 1021-22.

⁴⁶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1.

額上訴的可能。再者，儘管有肯定論者認為當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時，因該裁決額將被分配給州政府或其所設立的公益基金，故其律師將會建議其當事人進行和解以試圖獲取更多的該賠償金數額，如此將可避免該紛爭進入訴訟而達司法資源節省的目的⁴⁷。然而，反對論者卻認為此種觀點係與實踐結果背道而馳的，蓋若欲使懲罰性賠償金請求的案件量減少，其唯一方法即是去降低其訴訟上的金錢誘因，但多數州的立法者在採行數額分享制度時，通常均考慮到原告律師從該賠償金中取得勝訴報酬金（contingency fee）係為該賠償金制度能否繼續運作的重要因素，從而在立法上即規定該賠償金裁決額應先扣除律師費用後方得予以分配⁴⁸。如此，當原告律師們尚能夠從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中取得其律師費用時，此種金錢的訴訟誘因將持續地鼓勵著原告律師們提起該賠償金訴訟⁴⁹。因此，希冀透過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以達訴訟資源節省的此種想法，在該賠償金裁決額先行扣除律師費用後再予分配的立法規劃下，毋寧是一種緣木求魚的作法⁵⁰。

（二）誘引法官們違反應有的職業倫理

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運作下，當陪審團做出一份較高或過度的該賠償金裁決額時，初審法官或上訴法院通常均會利用減額命令（remittitur）等規則以減少或撤銷陪審團原先的裁決數額⁵¹。換言

⁴⁷ See Patrick White,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Split Recovery Statutes and Their Validity as a Tool of Modern Day "Tort Reform"*, 50 DRAKE L. REV. 593, 609 (2002).

⁴⁸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07.

⁴⁹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41.

⁵⁰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計算的規範技術上，各州究係如何處理律師費用的部分，請參閱本文後述之內容。

⁵¹ See generally KIRCHER & WISEMAN, *supra* note 6, § 18.

之，當現今法官們大多均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估算採取自動緩和的態度時，則該賠償金裁決額即已受到某種程度地限制而不致於發生失控的情形⁵²。然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下，其將可能改變法官們在該賠償金制度運作時原有的自動緩和機制⁵³，且當本案被告係為不受歡迎的或州外的大型企業時，更將可能導致法官們於該賠償金訴訟程序中產生偏袒而擴張該賠償金的適用及提高其責任成立的可能性，或維持該較高或已屬過度的該賠償金裁決額⁵⁴。蓋因多數州的初審法官均係經由選舉制度而產生⁵⁵，且實證數據亦顯示此些州已係對於州外被告較不友善，故倘又實行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時，即可能促使此些法官們在瞭解到該賠償金裁決額係有助於減少該州選舉人的納稅負擔或可資助於社會特定利益等情形下，而有意地或潛意識地做出偏袒的預審（pre-trial review）與相關證據的裁定，並提供可能將影響該賠償金訴訟結果的陪審團指示，且易於接受或維持較高或已屬過度的該賠償金裁決額，甚而最後在不違法的情形下有意地放寬該賠償金數額的司法審查⁵⁶。而此些負面情形，在即便是那些最具專業與誠信的法官們身上亦將可能基於其人性的驅使而產生相同的結果⁵⁷。因此，懲罰性賠償金數額

⁵² John Y. Gotanda, *Punitive Damag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42 COLUM. J. TRANSNAT'L L. 391, 422 (2004).

⁵³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38.

⁵⁴ *Id.* at 540.

⁵⁵ See generally Mark A. Behrens & Cary Silverman, *The Case for Adopting Appointive Judicial Selection Systems for State Court Judges*, 11 CORNELL J.L. & PUB. POL'Y 273, 314-60 (2002).

⁵⁶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40.

⁵⁷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1. 即便有論者認為此些法官們是不同於那些被選舉出來的行政或立法的官員們一般而具有法律專業與獨立性存在，但現實上此些被選舉的法官們仍舊必須某種程度地回應於那些選舉人，否則其將不會再次

分享制度將提供巨大的誘因而使法官們產生偏袒，並棄守該賠償金裁決額過度性司法審查的守門員角色，進而違反其職業倫理與法律的公平與正義⁵⁸。

(三)惡化原告與其律師間之利益衝突

在現今民事案件中，原告律師通常均會與其當事人簽訂勝訴報酬金契約，亦即原告律師於訴訟過程裡不得再向其當事人索取費用且有時甚而尚須預付暫墊費用（out-of-pocket costs），但於該案勝訴後即可獲取該賠償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為其報酬。因此，在律師勝訴報酬金契約下，原告律師事實上猶如是購買了其當事人訴因的其中部分⁵⁹，從而將易與其當事人在關於該案究應和解抑或提訴的意見上處於對立的狀態，因此致使原告律師與其當事人間具有潛在的利益衝突（conflicts of interest）⁶⁰。而當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時，此種原告律師與其當事人間的對立狀態將會加深，且彼此間本即具有的潛在利益衝突亦將更加惡化⁶¹。蓋在許多懲罰性賠償金案件中，原告的最佳利益有時或許應是將該案和解以減少訴訟上的折磨，並使其從中能夠確保某範圍的賠償金額⁶²；且

地連任。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40 n.84.

⁵⁸ *Id.* at 540-41.

⁵⁹ 此種情形便如同Olson教授在其所著《訴訟爆炸》（The Litigation Explosion）一書所云：「一旦一位律師在一起案件中已投入時間與金錢時，該名律師即係已將個人的賭金放在該案訴訟之結果上……」。WALTER K. OLSON, THE LITIGATION EXPLOSION: WHAT HAPPENED WHEN AMERICA UNLEASHED THE LAWSUIT 41-43 (1991).

⁶⁰ Victor E. Schwartz, Mark A. Behrens, Cary Silverman & Rochelle M. Tedesco,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Legal Marketplace: A Legal Consumer's Bill of Rights is Needed*, 15 LOY. CONSUMER L. REV. 1, 11 (2003).

⁶¹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45.

⁶² 此點便如同耶魯法學院教授Priest所評述的：「無受限制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

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下，使該案進入和解程序並協助原告最後能夠獲得較高且亦無須遭受分配的和解金額，更是為原告的最大利益⁶³。從而，基於原告最大利益之考量而協助其和解懲罰性賠償金案件，即是一位律師本應積極履行的職責與扮演的角色。然當多數州基於為使原告律師能夠從懲罰性賠償金訴訟中收取到全部的勝訴報酬金以助該賠償金制度之運作，而在其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中規定該賠償金裁決額應先扣除律師費用後方得逕予分配時⁶⁴，無異地將使原告律師以自身勝訴報酬金之利益為考量並以犧牲其當事人之和解利益為代價，而積極地勸誘或慫恿其具有和解利益的當事人進入訴訟以換取其獲得勝訴報酬金的可能性；且當原告對於此等數額分享制度的法律規定係處全然不知的狀態時，將導致此種情形變得更加地嚴重⁶⁵。從而，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不但將惡化原告與其律師間的潛在利益衝突，且甚而扭曲律師的職業倫理並損及法律的公平與正義⁶⁶。

額將影響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八的案件，於審理前即已和解而離開法院。一個懲罰性賠償金的請求將提高最終和解的強度且確實影響著整個和解過程的此種情形已係明顯且無爭論的餘地」。George L. Priest, *Punitive Damages Reform: The Case of Alabama*, 56 LA. L. REV. 825, 830 (1996).

⁶³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45.

⁶⁴ 現今多數州的此等法令均規定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應先扣除律師費用與相關訴訟費用後，再將剩餘部分予以分配，如此以保護律師報酬的利益而得以鼓勵其提起與協助訴訟。*Id.* at 537.

⁶⁵ *Id.* at 545.

⁶⁶ 此點，便如同美國法律學會在其1991年的報告書中所闡述的：「允許原告律師某種程度偶然地分配該州懲罰性賠償金裁決數額的其中部分，將引起其與原告間的潛在衝突……於是，我們並不支持懲罰性賠償金分享給該州政府的此種規定」。2 AM. LAW INST, REPORTERS' STUDY,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FOR PERSONAL INJURY, APPROACHES TO LEGAL INSTITUTIONAL CHANGE 259 n.49 (1991).

(四) 增強政府涉入或強索私人之財產

儘管多數州於制定自身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時，均無在其立法理由中明確地指出係為了充實州政府國庫稅收之目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此等法令確實具有增益政府稅收的實質效果，從而制定此等法令時，即意味著州政府可在原告所提懲罰性賠償金訴訟的努力成果後，毫不費力地便取得該賠償金裁決額的其中部分。換言之，州政府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運作下即消極地成為該賠償金案件的實質受益者或搭便車之人（free riders）⁶⁷，且相對地亦將影響到原告於該賠償金訴訟過程中的用心程度，並限制了其確保陳述的能力（abilities to secure representation）以及將被告繩之以法的可能性⁶⁸，甚而更嚴重的是，其將可能刺激並鼓勵著各州立法機關以法令制頒之方式而擴張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適用或進而提高其裁決額的範圍⁶⁹。是故，此等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除了在立法正當性方面將遭受質疑外，尚可能因增強了該賠償金的公法性格（public law）而進一步地引起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Excessive Fines Clause）上的疑慮⁷⁰。

其次，當施行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後，州政府將可能不再僅是消極地期待原告律師以其訴訟技巧或經驗來贏得該賠償金訴訟，且僅係機率性地成為該賠償金裁決額的實質受益人或搭便車之人，亦即其尚可能進一步地利用政府資源而直接地介入或暗中的協助原告以進行並贏得該賠償金訴訟⁷¹。例如在佛羅里達州一九九五

⁶⁷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26.

⁶⁸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18; *see also* White, *supra* note 47, at 604.

⁶⁹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38-39.

⁷⁰ *Id.* *See also* Owen, *supra* note 8, at 410 n.164.

⁷¹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39.

年一起涉及到該州數額分享法令是否包括仲裁賠償金在內的爭點問題的 *Miele v. Prudential-Bache Securities, Inc.*⁷² 案中，該州金融暨財務部門所提供給該州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amicus）意見書中即對之表示肯定並說到：「本州此等法令不僅適用於法院所判決的賠償金，且亦適用在仲裁方面的賠償金在內。蓋此種解釋可使原告與其律師較無利益可圖，從而將有助於阻止懲罰性賠償金訴訟請求的此種立法目的」⁷³。儘管該州最高法院最後拒絕該法庭之友的意見書⁷⁴，並姑且不論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所云的賠償金是否究應包括仲裁賠償金在內等爭議問題，當實施數額分享法令時，可預期的是，具有利害關係的州政府將會提供更多有利於原告主張的法庭之友意見書，以企圖從該賠償金裁決額中獲取到稅收上的利益，如此將使得州政府日後即便是提出再正確且嚴謹的意見書以供法院參酌時，其公正性方面亦將不斷地遭受到強烈的質疑⁷⁵。是故，儘管多數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均規定其並無賦予州政府介入至私人該賠償金訴訟的權利⁷⁶，但從實踐層面上來說，此等法令將使州政府對於原告能否贏得該賠償金訴訟及其所獲數額一事，不再處於中立且樂觀其成的態度，並轉而更積極地如同徵稅官（tax collector）一般的角色以介入至該賠償金訴訟之中，如此除了將增強政府涉入（government involvement）之程度而引起聯邦憲法過度

⁷² 656 So. 2d 470 (Fla. 1995).

⁷³ *Miele v. Prudential-Bache Sec., Inc.*, Case No. 81, 467 (1993).

⁷⁴ *See Miele*, Case No. 81 at 473.

⁷⁵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39.

⁷⁶ 例如阿拉斯加州法令規定：「本條項並無授予該州政府去提起或參與一起民事訴訟以獲取懲罰性賠償金的權利」。Alaska Stat. § 09.17.020(j). *See, e.g.*, Ga. Code Ann. § 51-12-5.1(e)(2); Mo. Ann. Stat. § 537.675(3). 而此些法令的此等規定，其目的均係爲了避免政府涉入至懲罰性賠償金訴訟而引起不必要的憲法疑慮。

罰金條款方面之疑慮外⁷⁷，更為嚴重的是，其將改變傳統上的民事訴訟動態，不僅是在懲罰性賠償金上的爭議，且尚亦包括填補性賠償金責任成立與否的前提問題在內⁷⁸，進而容易對於被告產生判決失當的不利後果⁷⁹。

參、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規範內容

在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日漸高漲而憂慮原告如獲彩券般意外之財的社會背景下，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⁸⁰，即已曾有十四個州經由法令制頒或司法判決等方式而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⁸¹。然因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概念本身，除了係為該賠償金法史上之創舉而備受關注外，其規範內容亦將影響著原被告、律師、公益團體以及州政府等各方彼此間之利益，並也衝擊到該賠償金制度本身的發展，且甚而涉及到人民基本權利的憲法層次問題。因此，現今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佛羅里達、堪薩斯、紐約等五個州基於各種考量因素或已遭判決違憲等情形下，而已廢除該

⁷⁷ See generally Paul F. Kirgi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e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50 WASH. & LEE L. REV. 843, 856-62 (1993); Clay R. Stevens, *Split-Recovery: A Constitutional Answer to the Punitive Damages Dilemma*, 21 PEPP. L. REV. 857, 857 (1994).

⁷⁸ 蓋現今通說均認為填補性賠償金責任乃係懲罰性賠償金訴訟能否進行的前提要件。See 1 SCHLUETER, *supra* note 28, at 358-62.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責任成立的先決問題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戴志傑，同註1，頁358-381。因此，倘州政府欲分得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時，其即有可能一併地協助原告進行填補性賠償金訴訟，從而致使傳統上的民事訴訟動態發生改變。

⁷⁹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39.

⁸⁰ See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06.

⁸¹ See generally Catherine M. 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113 YALE L.J. 347, 375-80 (2003).

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⁸²。因此，現今仍有阿拉斯加、喬治亞、伊利諾、印第安納、愛荷華、密蘇里、俄亥俄、奧勒岡、猶他等九個州依然在自身法令下或司法判決中持續地踐履⁸³。是故，在扣除禁止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五個州以及將該賠償金用作填補目的的二個州之後⁸⁴，現今尚有二十九個州從未實施過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⁸⁵。執此，為使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能夠全面地瞭

⁸² Cal. Civ. Code § 3294.5(b) (repealed 2006); Colo. Rev. Stat. § 13-21-102(4) (repealed 1995); Fla. Stat. Ann. § 768.73(2)(b) (repealed 1995); Kan. Stat. Ann. § 60-3402(e) (repealed 1989); N.Y. C.P.L.R. 8701 (repealed 1994)。此外，應特別指出的是，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曾一度透過判決而要求日後應對懲罰性賠償金實施數額分享制度，但最後於重審該判決時卻放棄了此種看法。See *Life Ins. Co. of Ga. v. Johnson*, 701 So. 2d 524 (Ala. 1997)。

⁸³ Alaska Stat. § 09.17.020(j); Ga. Code Ann. § 51-12-5.1(e)(2); 735 Ill. Comp. Stat. 5/2-1207; Ind. Code Ann. § 34-51-3-6; Iowa Code Ann. § 668A.1(2)(a)(b); Mo. Rev. Stat. § 537.675(3); *Dardinger v. Anthem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781 N.E.2d 121, 146 (Ohio 2002); Or. Rev. Stat. § 31.735(1)(b); Utah Code Ann. § 78-18-1。

⁸⁴ 禁止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五個州分別為路易斯安納州、麻薩諸塞州、內布拉斯加州、新罕布夏州以及華盛頓州；而康乃迪克與密西根等兩州則係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目的設定為填補之目的。關於美國各州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態度與現狀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戴志傑，同註1，頁200-210。

⁸⁵ 在此29個州裡，至少已有亞利桑納、夏威夷、紐澤西、新墨西哥、奧克拉荷馬以及田納西等6個州提出數額分享制度之法案，且除了紐澤西州之外，其餘各州的法案版本均是要求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全部交給該州政府的一般基金。See H.R. Con. Res. 2054, 47th Leg., 1st Reg., Sess. (Ariz. 2005); S. 328, 2003 Leg., 22d Sess., Reg. Sess. (Haw. 2003); Assem. 2283, 212th Leg. (N.J. 2006); S. 860, 47th Leg., Reg. Sess. (N.M. 2005); S. 764, 49th Leg., 1st Sess. (Okla. 2003); S. 978, 104th Gen. Assem. (Tenn. 2005); H.R. 1857, 104th Gen. Assem. (Tenn. 2005)。See generally Sharkey, *supra* note 30, at 476 n.122。儘管此些州所提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法案最終仍未獲得通過，但卻也凸顯各州政府對此制度的渴望而顯示出其積極立法的態度。

解並得以之作為後續比較法研究上之基礎，故以下即就該國十四個曾經或現仍實施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各州規範內容予以概述。

一、現仍實施數額分享制度的州

現今仍對懲罰性賠償金實施數額分享制度的九個州裡，諸如阿拉斯加、喬治亞、伊利諾、印第安納、愛荷華、密蘇里、奧勒岡、猶他等八個州乃係以制頒法令之方式，而僅唯獨俄亥俄州是其最高法院以判決之方式而加以實踐。對此，詳述如下：

(一)以法令方式制定

在經由法令方式以實施數額分享制度的八個州裡，幾乎所有的此等法令均已受違憲質疑而被提起訴訟，並已有七個州的最高法院對之判決合憲⁸⁶，而僅猶他州最高法院曾有對之判決違憲⁸⁷，但仍不具判決先例價值（*precedential value*）⁸⁸，且現今僅剩伊利諾州最高法院未曾處理過此等法令違憲與否的憲法層次問題。

1. 已判決合憲的州法令

在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採取數額分享法令且已受其最高法院判決合憲的七個州裡，例如阿拉斯加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倘若一位原告獲得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時，法院應要求該裁決額的百分之五十存放在該州的一般基金（*general fund*）」⁸⁹。換

⁸⁶ See *Evans v. State*, 56 P.3d 1046 (Alaska 2002);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 436 S.E.2d 635 (Ga. 1993); *Cheatham v. Pohle*, 789 N.E.2d 467 (Ind. 2003); *Shepherd Components, Inc. v. Brice Petrides-Donohue & Assocs.*, 473 N.W.2d 612 (Iowa 1991); *Fust v. Attorney General For Missouri*, 947 S.W.2d 424 (Mo. 1997); *DeMendoza v. Huffman*, 51 P.3d 1232 (Or. 2002).

⁸⁷ See *Smith v. Price Development Co.*, 125 P.3d 945 (Utah 2005).

⁸⁸ See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19 n.208.

⁸⁹ Alaska Stat. § 09.17.020(j).

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的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並無對之特別地明文，從而其結果實際上仍是原告從其所獲得的該賠償金份額中自行負擔之。此外，為避免引起政府涉入之疑慮，該州法令即規定：「本條款並無授予該州去提起或參與獲取懲罰性賠償金的民事訴訟的權利」⁹⁰，以解決不必要的聯邦憲法條款訴訟問題。最後，該州最高法院已於二〇〇二年的 *Evans v. State*⁹¹ 案中判決此等法令以及最高限額等法令之規定係屬合憲⁹²。

喬治亞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產品責任訴訟中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應在扣除相稱的訴訟成本，包括合理的律師費用後，其剩餘數額的百分之七十五應經由財政與會計服務部門（Office of Treasury and Fiscal Services）而支付給州政府國庫（state treasury）」⁹³。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僅適用於產品責任而不及於一般侵權訴訟之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係採取「先扣除，再分配」的立法模式，亦即明確要求該賠償金裁決額應先扣除律師費用等相關訴訟成本後方得逕予分配，以側重原告律師權益方面的保障。再者，為使州政府能夠順利取得其所享份額之部分，該法令即規定：「州政府乃如同判決履行前之確定判決債權人（judgment creditor）之地位」⁹⁴，如此以賦予州政府能夠就其所享份額部分逕予請求的權利。此外，該法

⁹⁰ Alaska Stat. § 09.17.020(j).

⁹¹ 56 P.3d 1046 (Alaska 2002).

⁹² *Evans*, 56 P.3d at 1046.

⁹³ Ga. Code Ann. § 51-12-5.1(e)(2).

⁹⁴ *Id.* at § 51-12-5.1(e)(2).

令曾於一九九〇年時遭聯邦地區法院 *McBride v. General Motors Corp.*⁹⁵ 乙案認為違反聯邦與州憲法上的正當程序 (Due Process)、平等保護 (Equal Protection) 以及過度罰金等條款而判決違憲⁹⁶，不過該州最高法院於一九九三年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⁹⁷ 乙案中已拒絕採納聯邦地區法院 *McBride* 乙案的判決意見，且最後並判決該州此等法令合憲⁹⁸。

印第安納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被告應將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支付給法院書記處 (court clerk)，而該書記處應將該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二十五支付給原告，剩餘數額的百分之七十五則應支付給州政府所設立的暴力犯罪被害人補償基金 (violent crime victims compensation fund)」⁹⁹。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並無對之特別地明文，從而其結

⁹⁵ 737 F. Supp. 1563 (M.D. Ga. 1990).

⁹⁶ *McBride*, 737 F. Supp. at 1579. 此外，該判決中亦有說到：「該法令乃係在無任何研究或史料以證明此等法令係保護該州經濟所必要的情形下而所加以制定的」，從而認為該州以促進州的合法利益為由而制定此等法令的正當性即顯不足。 *Id.* at 1569.

⁹⁷ 436 S.E.2d 635 (Ga. 1993).

⁹⁸ *Mack Trucks*, 436 S.E.2d at 640. *See also* *State v. Moseley*, 436 S.E.2d 632 (Ga. 1993). 之後，該州最高法院於1996年的 *Ford v. Uniroyal Goodrich Tire Co.* 乙案中再次重申並判決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並無違憲。 476 S.E.2d 565 (Ga. 1996).

⁹⁹ Ind. Code Ann. § 34-51-3-6. 特別應指出的是，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之所以規定數額分享的對象係為「暴力犯罪被害人補償基金」而異於其他各州之原因，乃係因為該州規定當被告已遭受到刑事責任判決時，則排除懲罰性賠償金責任的課予， *See, e.g., Moore v. Waitt*, 298 N.E.2d 456, 460 (Ind. Ct. App. 1973). 然而，此種分享對象的規定更容易引起懲罰性賠償金等於刑事罰金的實質效果而加深違憲之疑慮，從而備受論者所批評。

果實際上仍是原告從其所獲得的該賠償金份額中自行負擔之。再者，該法令最大的特色乃係在於明文要求被告應將被課予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直接支付給法院書記處，並再由該書記處將法定份額支付給原告，如此以使原告不曾實際取得該賠償金的全部數額，進而能夠迴避違憲徵收財產權（*taking of property*）之疑慮。此外，該州最高法院已於二〇〇三年 *Cheatham v. Pohle*¹⁰⁰ 乙案中認為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並無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Takings Clause*）之規定而最後判決該法令合憲¹⁰¹。

愛荷華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倘若被告行為係具體朝向原告時，該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之全部應支付給原告；若被告行為非係具體朝向原告者，則該賠償金裁決額在扣除所有適當的訴訟成本與花費後，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數額應支付給原告，而剩餘部分應支付給該州法院行政處（*state court administrator*）所管理的民事賠償信託基金（*civil reparations trust fund*）」¹⁰²。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的最大特色乃係在於其雖可適用在一般侵權訴訟之類型，但僅限於被告行為非係具體朝向原告的此種情形方有適用之餘地，如此以使數額分享給社會公益的此等目的更具正當性。其次，儘管該法令規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係屬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提供法院可否裁量的權限，但卻有賦予法院分配給原告最高份額比例方面的裁量權限，以使法院能夠斟酌個案情形而分配較高份額的比例來從事社會公益。再者，於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係採取「先扣除，再分配」的立法模式，以側重原告律師權益方面

¹⁰⁰ 789 N.E.2d 467 (Ind. 2003).

¹⁰¹ *Cheatham*, 789 N.E.2d at 477.

¹⁰² Iowa Code Ann. § 668A.1(2)(a)(b). 此外，該法令亦有規定：「支付給民事賠償信託基金的數額應僅專用於資助貧困的民事訴訟當事人或保險援助等計畫」。 *Id.* at § 668A.1(2)(b).

之保障。此外，該州最高法院已於一九九一年 *Shepard Components, Inc. v. Brice Petrides-Donohoe & Assocs., Inc.*¹⁰³ 乙案中認為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並無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正當程序條款以及平等保護條款等規定而判決該法令合憲¹⁰⁴；且並於一九九四年 *Spaur v. Owens-Corning Fiberglas Corp.*¹⁰⁵ 乙案中拒絕該法令違反過度罰金條款與雙重處罰條款（Double Jeopardy Clause）的此種論點而最後亦仍判決該法令合憲¹⁰⁶。

密蘇里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原告在獲得懲罰性賠償金之最終判決（final judgment）後，該賠償金裁決額在扣除律師費用與訴訟費用之後，該州政府對於剩餘數額的百分之五十具有留置權（lien），且應存放到該州侵權行為受害人補償基金（tort victims' compensation fund）之中」¹⁰⁷。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係採取「先扣除，再分配」的立法模式，以側重原告律師權益方面之保障。再者，該法令最大的特色乃係在於其明文賦予州政府對該賠償金所得份額部分具有留置權，如此即使得原告對該被留置的份額部分不曾擁有財產權，從而得以避免引起違憲徵收財產權之疑慮，且同時亦也賦予州政府對其所享份額部分得逕予請求的權利。最後，該州最高法院於一九九七年 *Fust*

¹⁰³ 473 N.W.2d 612 (Iowa 1991). 同年該州聯邦地區法院在 *Burke v. Deere & Co.* 案中判決認為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並無涉及到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所關切的問題。780 F. Supp. 1225, 1242 (S.D. Iowa 1991).

¹⁰⁴ *Shepard Components*, 473 N.W.2d at 619.

¹⁰⁵ 510 N.W.2d 854 (Iowa 1994).

¹⁰⁶ *Spaur*, 510 N.W.2d at 868.

¹⁰⁷ Mo. Rev. Stat. § 537.675(3).

v. Attorney General For Missouri¹⁰⁸ 乙案中認為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並無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與平等保護條款之規定而判決該法令合憲¹⁰⁹。

奧勒岡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四十應支付給勝訴當事人，且勝訴當事人的律師費用應由該份額中支付但不得超過該份額的百分之二十；而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六十應支付給司法部犯罪被害人援助小組（Department of Justice Crime Victims' Assistance Section）的刑事傷害補償帳戶（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Account）」¹¹⁰。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係採取「先分配，再從原告份額中扣除」的立法模式，亦即使公益基金獲取最大數額比例的份額以使其成為數額分享制度下的最大受益者，並使原告及其律師僅共享剩餘的數額部分，且律師費用僅能最多占其中的20%，如此以試圖降低原告律師提訴的金錢誘因而減少不必要的訴訟案件。再者，為使州政府能夠順利取得其所享份額之部分，該法令即規定：「司法部對於支付給刑事傷害補償帳戶的懲罰性賠償金份額部分應屬判決債權人（judgment creditor）身分一般」¹¹¹，

¹⁰⁸ 947 S.W.2d 424 (Mo. 1997).

¹⁰⁹ *Fust*, 947 S.W.2d at 424, 432.

¹¹⁰ Or. Rev. Stat. § 31.735(1). 此外，該法令亦有規定：「但若該勝訴當事人係為政府實體（public entity）時，則該百分之六十的份額即應支付給政府實體的一般基金（general fund）」。*Id.* at § 31.735(1).

¹¹¹ *Id.* at § 31.735(1). 由於該州數額分享法令要求懲罰性賠償金所分享的份額須支付到「刑事傷害補償帳戶」之中，從而即使得該法令本身之性質在刑事與民事法律之間更加地混淆不清，從而亦加深違憲可能之疑慮且遭受批評。See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09.

如此以賦予州政府得就其所享份額部分逕予請求的權利。最後，該州最高法院已於二〇〇二年DeMendoza v. Huffman¹¹²乙案中認為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並無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之規定而判決該法令合憲¹¹³。

2. 已有判決違憲的州法令

猶他州乃係唯一以法令方式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且其最高法院曾有判決該法令係屬違憲的州。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在懲罰性賠償金被裁決的任何案件中，法院應以如下方式做出判決：(1)應對原告做出最先的伍萬元數額的判決；(2)超過伍萬元部分的數額應被均分在該州政府與原告之間，且相應地對之做出各自的判決」¹¹⁴，而「在支付律師費用與訴訟費用後，分配給州政府的所有數額應被提交至州政府國庫而存入至一般基金之中」¹¹⁵。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該法令的最大特色乃是在於，其將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其中5萬元先行保留給原告，之後在關於訴訟費用的問題上，係針對超過5萬元的其餘數額部分，採取「先分配，再從基金份額中扣除」的立法模式，如此以使原告利益獲得最大的保障。此外，該州最高法院於二〇〇五年Smith v. Price Development Co.¹¹⁶乙案中認為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並無給予該州政府在原告的懲罰性賠償金方面的一種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從而該州政府在無提供適當的補償下分得原告的該賠償金裁決額，已構

¹¹² 51 P.3d 1232 (Or. 2002).

¹¹³ DeMendoza, 51 P.3d at 1247.

¹¹⁴ Utah Code Ann. § 78B-8-201(3)(a), renumbered by, 2011, ch. 79, § 18.

¹¹⁵ Id. § 78B-8-201(3)(f).

¹¹⁶ 125 P.3d 945 (Utah 2005).

成一種違憲性徵收原告財產權的結果，因此最後判決該法令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之規定¹¹⁷。

3. 尚未處理憲法疑慮的州法令

伊利諾州乃係唯一以法令方式實施數額分享制度且其最高法院迄今尚未有對之判決違憲與否的州。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初審法院得在自身裁量權下，於原告、原告律師以及伊利諾州政府的人類服務部門（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之間，分配懲罰性賠償金之裁決額」¹¹⁸。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且亦授予初審法院自行決定是否逕予分配以及其分配數額比例的裁量權限。不過，儘管該法令已有賦予初審法院數額分配方面的裁量權限，但其亦有特別針對律師費用之部分做出保留而規定：「從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中所支付給原告律師的份額應是合理的且不應考慮到律師勝訴報酬金契約（contingency fee contract）」¹¹⁹，亦即在關於律師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亦係採取「先扣除，再分配」的立法模式，僅是特別明文該費用的計算不應包括律師勝訴報酬金在內而已，如此以避免原告律師所得之份額占據過高的數額比例，而造成原告、原告律師以及州政府等三方間利益失衡之現象。此外，該州法令中亦有規定：「在分配本條項所規定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時，初審法院在其認為相關的其他考量因素之外，仍應考慮到被告對於原告是否負有任何特別的義務存在」¹²⁰，如此以期使初審法院在具體個案中行使其裁量權限時能夠特別斟酌原告利益之維護而做出適當的數額分配

¹¹⁷ *Smith*, 125 P.3d at 952.

¹¹⁸ 735 Ill. Comp. Stat. 5/2-1207.

¹¹⁹ *Id.* at 5/2-1207.

¹²⁰ *Id.*

比例。

(二)以判決方式實踐

在歷年施行過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的州裡，僅有俄亥俄州係以司法判決之方式來加以實踐。該州最高法院於二〇〇二年時對於一起涉及到保險惡意（bad faith）的Dardinger v. Anthem Blue Cross & Blue Shield¹²¹案件判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三分之二應分配給該州公立大學附設的癌症醫院與研究機構以及以死者為名所設立的基金¹²²。在該案中，Esther Dardinger女士罹患腦癌，且儘管病情嚴重但卻也靠著動脈內化療（intra-arterial chemotherapy）而獲得明顯的改善¹²³。然在經過幾次此種化療方法後，其保險公司Anthem卻以不曾評估該治癒性的一位醫師所組成的審查小組的報告意見，即擅斷地以此種化療方法僅是實驗性質為由而拒絕支付Esther此部分的保險金¹²⁴。於是，Esther在向該公司申訴並等候結果之同時，因認知到此種化療方法所費不貲且將迫使其家庭面臨破產，從而選擇嘗試其他的治療方法¹²⁵。當Anthem保險公司故意地拖延該保險金請求的程序時，Esther的病情迅速惡化旋而死亡，且在其出殯當天該保險金拒絕理賠書卻諷刺地寄送到其住家郵筒¹²⁶。因此，Esther的丈夫Robert Dardingers作為其妻子Esther的遺產執行人，即以Anthem保險公司違反契約（breach of contract）與

¹²¹ 98 Ohio St. 3d 77, 781 N.E.2d 121 (Ohio 2002).

¹²² Dardinger, 98 Ohio St. 3d at 105.

¹²³ Id. at 78.

¹²⁴ Id. at 79.

¹²⁵ Id. at 81-82.

¹²⁶ Id. at 85.

惡意拒絕理賠為由而提起訴訟¹²⁷。

本案陪審團在認定被告保險公司之行為係屬惡意後，即做出4,900萬元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不過該州最高法院最後將該筆金額減至3,000萬元。而在承審的過程中，Pfiefer法官除於判決書中痛斥被告保險公司之行為麻木不仁外¹²⁸，更重要的是其舉出裁決懲罰性賠償金以及該裁決額應予以分配的理由，且亦利用減價命令作為條件而達成該賠償金裁決額得以如願分配之目的¹²⁹。最後，該法院判決該賠償金裁決額的三分之一，即1,000萬元應分配給原告；而三分之二，即2,000萬元應在扣除律師費用及訴訟費用後，應支付給俄亥俄州公立大學附設的癌症醫院與研究機構以及以Esther女士為名所設立的癌症研究基金¹³⁰。執此，Pfiefer法官的本案判決創舉即開啟了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扉頁。而儘管Dardinger案的判決受到論者們的批評並引燃了該州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戰火，但姑且不論該數額分享制度於該州應否存廢及其作法是否正當等問題¹³¹，從該案的判決中可知，其乃係特別針對保險人惡意拒賠的特定訴訟類型所為的判決，且是否對於

¹²⁷ *Id.* at 77.

¹²⁸ *Id.* at 98.

¹²⁹ *Id.* at 104.

¹³⁰ *Id.* at 105.

¹³¹ See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17. 例如該案首席法官Moyer即對於此種前所未有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提出個人的強烈反對意見，並認為此種作法乃係充滿著非預期的且令人感到不悅的後果。See *Dardinger*, 781 N.E.2d at 147 (Moyer, C.J., concurring in part & dissenting in part). 此外，亦有論者指出僅有立法機關方有權利限制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配與否的問題，從而認為該案判決的作法乃係侵犯到立法權。See generally Jessica Nielsen, *A True Hollywood Story: Alternative Distributions and the Ohio Supreme Court's Dardinger v. Anthem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72 U. CIN. L. REV. 815, 835-42, 845 (2003).

該賠償金裁決額逕予分配乃係屬法院的裁量權限，其中亦包括數額分配的比例及其對象在內。此外，在關於訴訟費用的問題上，則係採取「先分配，再從基金份額中扣除」的立法模式，如此以使原告獲得最大的保障。

二、曾經實施數額分享制度的州

昔日曾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實施數額分享制度的五個州裡，諸如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堪薩斯、紐約等四個州係因其數額分享法令訂有落日條款或經由立法行動等方式而加以廢止，而僅有科羅拉多州係其最高法院以判決方式宣告該法令違憲而不再實施的州。對此，詳述如下：

(一)以落日條款廢止

在採取落日條款或立法行動等方式而廢止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四個州裡，例如加州昔日二〇〇四年所制定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根據一起最終判決所裁決的懲罰性賠償金應在扣除律師勝訴報酬金後而以如下方式支付：1. 百分之七十五應被支付給州政府國庫所設立的公益信託基金（**Public Benefit Trust Fund**）並由財政部門加以管理。存放在公益信託基金的數額應用於預算法（**Budget Act**）方面的年度撥款，且應用在符合該賠償金性質的目的，但不應用於資助法院或司法上的計畫。2. 百分之二十五則支付給原告或原告們」¹³²。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

¹³² Cal. Civ. Code § 3294.5(b), effective August 16, 2004, Stats 2004 ch 227 § 8.5 (SB 1102), repealed July 1, 2006.

問題上，係採取「先扣除，再分配」的立法模式，以側重原告律師權益方面之保障。此外，該法令中亦有明文其落日條款而規定該法將於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屆期而失效¹³³。

佛羅里達州昔日一九八六年所制定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在人身傷害或不當致死訴訟中，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六十應支付給公共醫療援助信託基金（**public medical assistance trust fund**），剩餘的百分之四十則支付給原告；而在其他訴訟中，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六十應支付給州政府的一般收入基金（**general revenue fund**），剩餘的百分之四十則支付給原告」¹³⁴。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但特別針對人身傷害或不當致死訴訟等特定侵權案件與一般侵權案件之間所應分配的對象及其份額，區分出其相異的規定。其次，該法令乃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再者，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並無對之特別地明文，從而其結果實際上仍是原告從其所獲得的該賠償金份額中自行負擔之。此外，該州數額分享法令曾於一九九二年時經該州聯邦地區法院 *Gordon v. State*¹³⁵ 乙案認為並無違反憲法徵收條款與平等保護條款而判決合憲¹³⁶，且該案判決亦嗣後受到該州最高法院所維持¹³⁷。不過，儘管該州最高法院已判決該州數額分享法令合憲，但其立法機關於一九九二年修正該法令而將分享給「公共醫療援助信託基金」或「一般收入基金」的份額比例降低為35%，以防止州政府獲得過高數額而致使律師在勝

¹³³ *Id.* at § 3294.5(i).

¹³⁴ Fla. Stat. Ann. 768.73(2)(b), repealed by, 1992 Fla. Laws 821, 822

¹³⁵ 585 So. 2d 1033 (Fla. Dist. Ct. App. 1991), *aff'd*, 608 So. 2d 800 (Fla. 1992).

¹³⁶ *Gordon*, 585 So. 2d at 1035-38.

¹³⁷ *Gordon*, 608 So. 2d at 802.

訴報酬金契約下不願進行該賠償金訴訟¹³⁸，然卻也同時制定落日條款而使得該法令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屆期失效¹³⁹。

堪薩斯州與紐約州均曾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定數額分享法令，且立法同時亦於其中訂下落日條款而使之屆期廢止，且於施行上可謂是曇花一現。其中，堪薩斯州昔日一九八五年所制定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僅規定：「根據本條醫療疏失訴訟所裁決的任何懲戒性或懲罰性賠償金，所獲賠與收取到的此種賠償金數額的百分之五十應支付給原告，其餘的百分之五十應支付給州政府的會計部門而存入到國庫之中而用以設立醫療照顧安定基金（Health Care Stabilization Fund）」。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醫療疏失的特定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並無對之特別地明文，從而其結果實際上仍是原告從其所獲得的該賠償金份額中自行負擔之。此外，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中亦有明文其落日條款而規定該法將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止屆期失效¹⁴⁰。至於紐約州昔日一九九二年所制定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則僅有規定：「在任何裁決懲罰性賠償金給私人當事人的民事訴訟案件中，除了係對於州政府所課予的之外，該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二十應支付給州政府的一般基金」。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的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並無對之特別地明文，從而其

¹³⁸ Act of April 8, 1992, 1992 Fla. Laws ch. 92-85, 2, at 822.

¹³⁹ Act of May 24, 1997, 1997 Fla. Laws ch. 97-94, 16, at 574.

¹⁴⁰ Kan. Stat. Ann. § 60-3402(e), effective July 1, 1985, ch. 197, § 2, repealed by, 1988 Kan. Sess. Laws 209, § 1.

結果實際上仍是原告從其所獲得的該賠償金份額中自行負擔之。再者，該法令較為特殊的是，其特別針對政府機關遭懲罰性賠償金課予的案件，明文禁止對之施以數額分享制度，以避免其可從分配的份額中取回應受責難範圍且已經支付的該賠償金數額。此外，該法令中亦有明文其落日條款而規定該法將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屆期失效¹⁴¹。

(二)以判決方式廢除

科羅拉多州昔日一九八七年的數額分享法令規定：「所有合理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三分之一應支付給州政府的一般基金，其餘三分之二應支付給受害人」¹⁴²。換言之，該州數額分享法令乃係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且為一種強制性分配而無賦予法院可否裁量數額分享及決定其數額比例的權限。其次，在訴訟費用的問題上，該法令並無對之特別地明文，從而其結果實際上仍是原告從其所獲得的該賠償金份額中自行負擔之。此外，該州最高法院於一九九一年 *Kirk v. Denver Publishing Co.*¹⁴³ 乙案中以該州法令構成無任何補償下徵收人民財產為由而認為違反該州與聯邦憲法徵收條款之規定並最後判決違憲¹⁴⁴。是故，在 *Kirk* 案判決後，該州立法機關即以法令方式而廢除數額分享制度，且該州最高法院迄今仍舊以違反憲法徵收條款為由而堅持其立場，如此即使得該州成為全國唯一宣布此種數額分享法令係屬違憲，並以立法方式加以廢除的州¹⁴⁵。

¹⁴¹ N.Y. C.P.L.R. 8701, effective April 10, 1992, ch 55, § 393, repealed by, 1992 N.Y. Laws 55, 427(dd).

¹⁴² Colo. Rev. Stat. § 13-21-102(4) (repealed 1995).

¹⁴³ 818 P.2d 262 (Colo. 1991).

¹⁴⁴ *Kirk*, 818 P.2d at 270-72.

¹⁴⁵ See Sharkey, *supra* note 81, at 373 n.75.

肆、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司法審查

儘管現今仍舊無法斷言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是否將產生如同反對者論說般的上述負面情況，但可確知的是，某些州的此等法令在實踐過程中已遭遇到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徵收條款（Takings Clause）、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以及第八修正案過度罰金條款（Excessive Fines Clause）等方面的司法審查¹⁴⁶。然雖說聯邦最高法院迄今仍未對此等法令所涉的聯邦憲法條款疑慮簽發調閱令（Writ of Certiorari）予以審理¹⁴⁷，但不可否認的是，已有若干州的法院對此已做出判決意見且具高度地參考價值。是故，以下即就此等法令所涉相關聯邦憲法條款疑慮的審查重點及若干法院的判決意見予以分析說明。

¹⁴⁶ 此外，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亦也遭受到被告以此法令將造成該賠償金過度裁決為由而提起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方面的訴訟。不過，最後均遭各法院判決敗訴。Grube, *supra* note 8, at 867; Stepanian II, *supra* note 8, at 311. See, e.g., Gordon v. State, 608 So. 2d 800, 801-02 (Fla. 1992); McBride v. General Motors Corp., 737 F. Supp. 1563, 1579 (M.D. Ga. 1990); Shepard Components, Inc. v. Brice Petrides-Donohoe & Assocs., Inc., 473 N.W.2d 612, 619 (Iowa 1991). 此外，亦有論者認為近年聯邦最高法院所關切及強調的事項乃是，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不可在一種恣意或擅斷的模式下而被加以估算，因此主張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僅是對於該賠償金裁決額予以重新分配的此種作法，並不會構成正當程序條款的違反。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48. 執此，本文以為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下所可能造成該賠償金過度裁決之情形，並非係屬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本身」有涉正當程序條款之問題，故即不特別針對此等問題予以論述說明。

¹⁴⁷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19-20; Kimberly A. Pace, *Recalibrat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through National Punitive Damage Reform*, 46 AM. U. L. REV. 1573, 1595 (1997).

一、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之徵收條款

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之徵收條款規定：「非經適當補償，不得將私有財產徵為公用」¹⁴⁸，亦即禁止政府機關在無提供適當補償之情形下，以公眾使用為由而徵收私人之財產。對此，聯邦最高法院早在一八九八年 *McCullough v. Virginia*¹⁴⁹ 乙案中即有指出，立法機關不得徵收一個已被判決所既定的財產權（vested property right）¹⁵⁰；且亦曾於一九七二年 *Bd. of Regents of State Colleges v. Roth*¹⁵¹ 乙案中表示，財產權之創設及其範圍，並非係由聯邦憲法而是由州法的現行規則或共議所加以確定¹⁵²。故而，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所涉徵收條款之問題上，現今即有若干州的法院以此而對之做出判決，且幾乎全部均認為該州此等法令並無違反徵收條款之規定¹⁵³，而僅有科羅拉多州係屬例外¹⁵⁴。是故，以下即就此等法令是否違反徵收條款規定的審查重點及州法院的判決意見予以分析：

(一) 違憲爭議的審查重點

由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主要目的係為了使原告無法

¹⁴⁸ U.S. Const. amend. V (“...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¹⁴⁹ 172 U.S. 102 (1898).

¹⁵⁰ *McCullough*, 172 U.S. at 123-24.

¹⁵¹ 408 U.S. 564 (1972).

¹⁵² *Bd. of Regents of State Colleges*, 408 U.S. at 577.

¹⁵³ See *Cheatham v. Pohle*, 789 N.E.2d 467, 470 (Ind. 2003); *Fust v. Attorney General*, 947 S.W.2d 424, 431 (Mo. 1997);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 436 S.E.2d 635, 639 (Ga. 1993); *Shepherd Components, Inc. v. Brice Petrides-Donohue & Assoc., Inc.*, 473 N.W.2d 612, 619 (Iowa 1991).

¹⁵⁴ See *Kirk v. Denver Publ’g Co.*, 818 P.2d 262 (Colo. 1991).

獲取或降低意外之財，故其作法即是將該賠償金的其中份額分配給州政府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特定基金，並使勝訴原告無法獲得該賠償金的全部數額。從而，在此情形下即使得勝訴原告認為其理應全數獲取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財產權」遭到違憲性地徵收，進而提起聯邦憲法徵收條款的訴訟，並因此引起此等數額分享制度於該憲法條款上之疑慮。是故，當初審法院根據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之規定而將該賠償金裁決額予以分配時，即使得聯邦憲法徵收條款成為該法令上最常被爭執的憲法問題¹⁵⁵。而法院在審理該州此等法令是否有違徵收條款規定之爭點時，通常均將焦點放在該法令的規範內容究竟有無致生違憲性徵收私人財產權之情事，且判斷的重點乃是「原告對該案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究竟是否具有財產權利」的問題上。若為肯定，則此等法令將構成違憲性地徵收私人財產並因此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之規定；反之，則否。

(二)若干法院的判決意見

在首宗探究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是否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並最後判決該州此等法令係屬合憲的佛羅里達州上訴法院一九九一年 *Gordon v. State*¹⁵⁶ 乙案中，初審法院根據該州一九八六年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¹⁵⁷ 而命原告應將該案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60%支付給該州政府的一般收入基金。於是，

¹⁵⁵ Rabe, *supra* note 18, at 347; Stepanian II, *supra* note 8, at 315.

¹⁵⁶ 585 So. 2d 1033 (Fla. App. 1991).

¹⁵⁷ 該州1986年版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在人身傷害或不當致死訴訟中，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六十應支付給公共醫療援助信託基金，剩餘的百分之四十則支付給原告；而在其他訴訟中，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百分之六十應支付給州政府的一般收入基金，剩餘的百分之四十則支付給原告」。Fla. Stat. Ann. 768.73(2)(b), repealed by, 1992 Fla. Laws 821, 822.

原告即以此等法令係屬違憲而向聯邦上訴法院提起救濟。該院在審理此一爭議時，即將重點集中在「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具有權利性格」，亦即原告是否具有取得該賠償金的權利之問題上¹⁵⁸，並且說到：「一位原告在懲罰性賠償金的獲取上，並無任何可審理的（cognizable）或可保護的權利存在。懲罰性賠償金的允許，乃係完全建立在公共政策的考量基礎上，而與填補性賠償金之權利性格不同。因此，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存有原始性權利（inchoate claim），係完全受到立法機關決定的此種見解，已是相當清楚且明確的。故在立法機關裁量權的行使下，其得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施加任何條件或甚而完全地廢除該賠償金制度」¹⁵⁹，從而最後判決該州此等法令並無構成違憲徵收的問題¹⁶⁰。因此，原告即上訴至該州最高法院，且該院於審理此爭議時亦說到：「原告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並不存有任何財產權利（property right），蓋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並非係為填補原告，而係基於公共政策之考量；且就其制度本身以言，立法機關本具有充分的權力可對於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施加其認為係屬適當的任何條件」¹⁶¹。換言之，該院再次重

¹⁵⁸ 現今通說均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係與填補性賠償金不同而非屬一種權利事項，*See, e.g., W. PAGE KEETON ET AL., PROSSER & KEETON ON THE LAW OF TORTS* § 2, at 14 (1984). 因此，原告對懲罰性賠償金即不具有任何對人權（personal right），亦即原告對該賠償金無任何財產利益之存在也。Janie L. Shores, *A Suggestion for Limited Tort Reform: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to Eliminate Windfalls*, 44 ALA. L. REV. 61, 90 (1992). 然亦有認為當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一經法院判決後，原告對該賠償金數額即具有財產權利。Kirgis, *supra* note 77, at 850-51; C. J. Martin, *Casnote: Dardinger v. Anthem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Judicial Redistribu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40 SAN DIEGO L. REV. 1649, 1666 (2003).

¹⁵⁹ *See Gordon*, 585 So. 2d at *4-6.

¹⁶⁰ *See id.* at *7-11.

¹⁶¹ *Gordon*, 608 So. 2d at 801.

申本案上訴法院的判決意見，且最後判決該州此等法令並無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之規定而維持上訴審之判決¹⁶²。

然而，儘管所有已實施且審理過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之徵收條款疑慮的州均已全數做出合憲性的判決意見，但唯獨科羅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在其一九九一年的 *Kirk v. Denver Pub. Co.*¹⁶³ 乙案中做出相異性地判決，並成為唯一以徵收條款之違反為由而宣告此等法令係屬違憲的州。在該案中，初審法院根據該州一九八九年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¹⁶⁴ 而命原告應將其所獲得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三分之一支付給州政府的一般基金。於是，原告即以此等法令違反聯邦憲法相關條款之規定而提起上訴以為救濟。而該州最高法院於審理此等法令是否構成徵收條款之違反的爭點問題時說到：「毫無疑問地，在本州法令的規定下，一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的做出，即使得原告取得一個財產利益（property interest）的資格；且當一起判決被做出後，該原告即已從判決債務人（judgment debtor）的動產與不動產上取得賠償金的既得權（vested right），故原告在該賠償金的全部裁決額上即具有財產利益之存在」¹⁶⁵。此外，該法院亦指出：「當一起終局判決（final judgment）創設出財產利益時，該州的立法機關即不能再透過立法

¹⁶² *Gordon*, 608 So. 2d at 802.

¹⁶³ 818 P.2d 262 (Colo. 1991).

¹⁶⁴ 該州1989年版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規定：「所有合理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三分之一應支付給州政府的一般基金，其餘三分之二應支付給受害人」。Colo. Rev. Stat. § 13-21-102(4) (repealed 1995). 此外，應特別指出與留意的是，該州此等法令乃係異於其他州的此等法令而具有其獨特性，蓋該法令乃係要求原告在獲得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判決後，再去提交該數額的其中部分給該州政府的一般基金。*Id.* 從而方才導致該州最高法院對於此等法令做出違憲性徵收的此種判決意見。

¹⁶⁵ *Kirk*, 818 P.2d at 267, 269.

的方式而減縮該利益的範圍」¹⁶⁶。因此，該法院最後認為因本案原告已獲得懲罰性賠償金全部裁決額的既定權利，從而判決該州此等法令係在沒有提供原告任何適當補償的情形下以使州政府取得原告所獲該賠償金的三分之一數額，故屬違憲性地徵收原告的財產利益並違反聯邦憲法徵收條款之規定¹⁶⁷。

二、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之平等保護條款

美國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之平等保護條款規定：「任何州亦不得對其管轄範圍內的任何人拒絕給予法律上的平等保護」¹⁶⁸，且該條款之實質內涵係指，沒有任何一個州得以法令或政府行為（state action）而對於相似處境（similarly situated）之人給予差別對待（discriminate），亦即該條款並不禁止法令或政府行為對於不同群體來進行分類（class）且給予不同對待，蓋對於不同處境之人或事務給予相異之對待乃屬一種合理的政策選擇也¹⁶⁹。換言之，平等保護條款所欲禁止的並非係該差別對待本身，而是那些恣意且不合理地對於不同群體間進行分類並給予差別對待的法令或政府行為。是故，當法令或政府行為對於不同群體進行分類並給予差別對待時，只要其具有政府利益（state interest）並使相似處境之人均得到相似之對待者，即無違平等保護條款¹⁷⁰。而在懲罰性賠償金數

¹⁶⁶ *Id.* at 272.

¹⁶⁷ *Id.* at 272-73.

¹⁶⁸ U.S. Const. amend. 330, § 1 (“nor shall any State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¹⁶⁹ *See generally* 2 RONALD D. ROTUNDA & JOHN E. NOWAK, TREATISE ON CONSTITUTIONAL LAW: SUBSTANCE AND PROCEDURE § 14.7 (2d ed. 1992).

¹⁷⁰ Kirgis, *supra* note 77, at 856 n.90. 當系爭法令或政府行為既無涉及到「可疑分類」，亦沒有影響到「基本權利」時，法院即以合理基礎審查標準（rational

額分享法令是否有違平等保護條款規定之問題上，現今已有若干州的法院已做出判決，且均一致地認為此等法令雖有使特定訴訟與一般訴訟類型的原告間，在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所獲數額方面產生差別對待，但仍無構成平等保護條款之違反¹⁷¹。從而，以下即就此等法令是否違反平等保護條款規定的審查重點及州法院的判決意見予以分析：

(一) 違憲爭議的審查重點

由於若干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僅要求諸如產品責任¹⁷²、醫療疏失¹⁷³、人身傷害¹⁷⁴或不當致死¹⁷⁵等特定訴訟類型的該賠償金裁決額須進行分配，而不及於一般的侵權行為訴訟類型，故即使得特定訴訟類型的該案原告認為此等法令之規定已造成其與

basis test) 而對之進行平等保護條款的合憲性審查；且在此情形下，倘若該系爭法令或政府行為與合法的政府利益 (legitimate state interest) 具有某種合理關聯性 (rationally related) 時，則其將可通過該聯邦憲法條款之檢驗。Parham v. Hughes, 441 U.S. 347, 351 (1979)。換言之，當系爭法令或政府行為受到平等保護條款之訴訟時，除非其差別對待涉及到可疑分類、準可疑分類或侵犯到基本權利，否則該州政府僅須證明該差別對待之分類，對於合法的政府利益方面具有某種合理關聯性存在，即能順利通過平等保護條款之檢驗。See, e.g., Romer v. Evans, 517 U.S. 620, 631 (1996); Vacco v. Quill, 521 U.S. 793, 799 (1997)。

¹⁷¹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54. See, e.g.,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 436 S.E.2d 635 (Ga. 1993); Gordon, 608 So. 2d at 802; Fust v. Attorney General, 947 S.W.2d 424 (Mo. 1997).

¹⁷² Ga. Code Ann. § 51-12-5.1(e)(2).

¹⁷³ Kan. Stat. Ann. § 60-3402(e) (expired 1989).

¹⁷⁴ Iowa Code Ann. § 668A.1(2)(b); Fla. Stat. Ann. § 768.73(2)(b), (4) (1986), repealed by, 1992 Fla. Laws c. ss. 2, 3, ch. 92-85.

¹⁷⁵ Fla. Stat. Ann. § 768.73(2)(b), (4) (1986), repealed by, 1992 Fla. Laws c. ss. 2, 3, ch. 92-85.

一般訴訟類型的原告間產生差別對待，故而提起聯邦憲法平等保護條款之訴訟¹⁷⁶，並因此引起此等法令於該憲法條款上之疑慮¹⁷⁷。而關於僅要求特定訴訟類型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須逕予分配的數額分享法令，是否有違聯邦憲法平等保護條款之規定的爭點問題上，法院間已一致地以「合理基礎審查標準」來進行檢驗¹⁷⁸，且審查之重點均放在「該州此等法令所形成的『差別對待』與『合法的政府利益』間是否具有某程度的『合理關聯性』存在」之判斷上；且通常只要該州政府能夠證明此等法令所形成的差別對待具有合法的政府利益時，即可通過該憲法條款之檢驗¹⁷⁹。

(二)若干法院的判決意見

在喬治亞州最高法院一九九三年一起涉及到產品責任訴訟的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¹⁸⁰ 乙案中，原告即以該州懲罰性賠償金

¹⁷⁶ See *Gordon*, 608 So. 2d at 802;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 436 S.E.2d 635, 639 (Ga. 1993); *Fust v. Attorney General*, 947 S.W.2d 424, 432 (Mo. 1997).

¹⁷⁷ *Kirgis*, *supra* note 77, at 856 n.90; *Stevens*, *supra* note 77, at 881-82.

¹⁷⁸ *Kirgis*, *id.* at 856 n.90. 蓋此些數額分享法令並無涉及到「可疑分類」、「準可疑分類」或侵犯到「基本權利」，且即便該案原告可能主張此等法令已否定其獲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本權利」，但因各州立法機關具有廣泛裁量權以決定是否允許或限制該賠償金的此種見解已是普遍觀點的情形下，原告以此論點的主張將注定是失敗的。*Stevens*, *id.* at 881 n.172; *Kirgis*, *id.*

¹⁷⁹ *Stevens*, *id.* at 882;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54. 蓋因在「合理基礎審查標準」之下，對於一個州的法令是否具有「合法的政府利益」一事，法院幾乎已無條件地遵從於該州立法機關之判斷。*Kirgis*, *id.* See, e.g., *Massachusetts Bd. of Retirement v. Murgia*, 427 U.S. 307, 314 (1976).

¹⁸⁰ 436 S.E.2d 635 (Ga. 1993). See generally James E. Lee II,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 The Georgia Supreme Court Tells the Legislature to Keep on Truckin' When Appropriating Punitive Awards to the State Treasury*, 45 MERCER L. REV. 1439, 1439 (1994).

數額分享法令要求產品責任案件所課的該賠償金裁決額75%應支付給州政府一般基金的此等規定¹⁸¹，並無對於其他類型訴訟的原告做出同樣地要求為由，而主張此等法令係違反聯邦憲法平等保護條款¹⁸²。對此，該州最高法院即以「合理基礎審查標準」做出判斷¹⁸³，並且說到：「在產品責任訴訟中，社會大眾與受到傷害的原告之間具有相互排擠的風險存在，故該法令以剝奪原告意外之財等方式而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懲罰目的得以實踐，乃係具有其合法的目的存在；且實際上，所有相似處境的原告們與被告們均亦係受到相同地對待而無所差別，故此等法令並無違聯邦憲法平等保護條款」¹⁸⁴。因此，該州最高法院最後即以上述理由而撤銷初審法院之判決¹⁸⁵。

又如在密蘇里州最高法院一九九七年Fust v. Attorney General¹⁸⁶乙案中，原告主張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¹⁸⁷乃係要求沒有和解其訴訟案件的原告們將其所獲該賠償金數額的其中部分支付給州政府所設立的公益基金，而使其與那些已和解訴訟案件的原告們之間產生差別對待，因此違反聯邦憲法平等保護條款¹⁸⁸。

¹⁸¹ Ga. Code Ann. § 51-12-5.1(e)(2).

¹⁸² *Mack Trucks*, 436 S.E.2d at 637-38.

¹⁸³ 該法院說到：「法令的分類（statutory classification）必須與其立法目的之間具有一種公平且實質的關聯性（a fair and substantial relation to the object of the legislation）存在，以使相似處境之任何人均能受到相同之對待」，亦即該院明確地指出係採取「合理基礎審查標準」以判斷此等問題。*Id.* at 638.

¹⁸⁴ *Id.* at 638-39.

¹⁸⁵ *Id.* at 639.

¹⁸⁶ 947 S.W.2d 424 (Mo. 1997). See generally Benjamin F. Evans, "Split-Recovery" Survives: The Missouri Supreme Court Upholds the State's Power to Collect One-Half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63 MO. L. REV. 511, 511 (1998).

¹⁸⁷ Mo. Rev. Stat. § 537.675(3).

¹⁸⁸ *Fust*, 947 S.W.2d at 431-32.

對此，該州最高法院在採取「合理基礎審查標準」以為判斷時指出：「沒有涉及到『可疑分類』或『侵犯基本權利』的社會與經濟方面的立法，諸如此種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則必須被認為沒有違反平等保護條款，當該立法手段是『合理關聯於合法的政府利益時』」，且並進一步地說到：「該州此等法令乃係合理關聯於『鼓勵和解以避免當事人間與法院間的訴訟負擔』等方面的合法政府利益」¹⁸⁹。因此，該州最高法院最後即判決該州此等法令之規定並無構成聯邦憲法平等保護條款之違反。

三、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之過度罰金條款

美國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規定：「不得要求過度的保釋金，不得科以過度的罰金，不得施予殘酷的和異常的刑罰」¹⁹⁰，亦即該修正案包括有過度保釋金條款（Excessive Bail Clause）、過度罰金條款以及殘酷且異常刑罰條款（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Clause）等三種內容。而在該修正案的適用問題上，因聯邦最高法院已一貫地認為其規範目的乃係為限制政府機關濫用其檢察權（governmental abuse of its prosecutorial power），故使得其長期地僅適用在刑事訴追與處罰的案件類型上¹⁹¹。不過，該院亦曾經表示，倘若一種制裁（sanction）的規定本身係為處罰之目的時，即便其是規範在非刑事法令之中者，亦有該修正案的適用餘地¹⁹²。

¹⁸⁹ *Id.* at 432.

¹⁹⁰ U.S. Const amend. VIII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

¹⁹¹ *Browning-Ferris Indus. v. Kelco Disposal*, 492 U.S. 257, 262-63 (1989). *See, e.g.*, *Ex parte Watkins*, 7 Pet. 568, 573-574 (1833); *Fong Yue Ting v. United States*, 149 U.S. 698, 730 (1893); *Ingraham v. Wright*, 430 U.S. 651, 664, 667 (1977).

¹⁹² *See, e.g.*, *Trop v. Dulles*, 356 U.S. 86, 94-96 (1958).

因此，除非該案中系爭非屬刑事法令所明文的制裁規定已被判斷是為一種處罰之目的而屬刑事上之本質，否則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即僅適用在刑事訴訟程序案件與刑事處罰的法令類型而已。換言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的適用範圍似已建立起如此觀念：當一種制裁規定係為處罰之目的而具刑事本質時，即便其非隸屬於刑事法領域的立法分類之中，亦不因而便排斥該修正案相關條款的適用可能。

然在非為刑事立法領域且已公認係屬準刑事上的（quasicriminal）性質¹⁹³與民事陪審團所強加的私人罰金（private fines）¹⁹⁴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上，究竟有無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之適用，聯邦最高法院卻於一九八九年 *Browning-Ferris Indus. v. Kelco Disposal*¹⁹⁵ 乙案中做出否定性的判決意見¹⁹⁶；且由於 *Browning-Ferris* 乙案之判決中揭示一段重要格言：「當政府機關既未起訴該行為，且亦無收取該賠償金其中份額的任何權利時，則在民事訴訟案件中的金錢賠償裁決即不受到過度罰金條款之限制」¹⁹⁷，故而成為若

¹⁹³ 1 SCHLUETER, *supra* note 28, at 80; see also John Calvin Jeffries, Jr., *A Comment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Punitive Damages*, 72 VA. L. REV. 139, 149-51 (1986); Kenneth Mann, *Punitive Civil Sanctions: The Middleground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Law*, 101 YALE L.J. 1795, 1810-13 (1992).

¹⁹⁴ 聯邦最高法院於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乙案中首度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性質表示意見，並且說到：「懲罰性賠償金乃係民事陪審團為懲罰可受非難的行為以及嚇阻其再次發生而所強加的『私人罰金』」。418 U.S. 323, 350 (1974).

¹⁹⁵ 492 U.S. 257 (1989).

¹⁹⁶ 聯邦最高法院於該案中基於此修正案的制頒歷史與其規範目的，以及懲罰性賠償金裁決僅是私人間的民事案件而無涉該修正案所關切的政府濫用檢察權之情形等理由，而認為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並無適用於私人民事案件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 *Browning-Ferris*, 492 U.S. at 259, 262, 265, 274-75.

¹⁹⁷ *Id.* at 263-64 (“it does not constrain an award of money damages in a civil suit

干州法院日後援引並以之作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有無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適用的審查依據。然儘管此些法院對於 **Browning-Ferris** 乙案判決格言的重點有著不同的解讀，但幾乎全部均認為該州此等法令並無受到過度罰金條款的限制¹⁹⁸，而僅有喬治亞州的聯邦法院曾有做出相異性地判決意見¹⁹⁹。是故，以下即就此等法令是否有過度罰金條款適用餘地的審查重點及州法院的判決意見予以分析：

(一) 違憲爭議的審查重點

由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係規定該賠償金裁決額應分配部分比例給州政府的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特定基金，並賦予其有收取該賠償金所受分配份額的權利，從而使得州政府在此等法令的作用下即能夠搭便車地獲取該賠償金的部分數額，如此亦也同時地增強了該賠償金的公法性格²⁰⁰；且州政府在此種情形下的民事訴

when the government neither has prosecuted the action nor has any right to receive a share of the damages awarded.”). 此外，該院並以此格言涵攝到本案爭點而說到：「佛蒙特州的政府機關既沒有如同刑事案件般地採取積極步驟去處罰，且亦沒有為了增加稅收（raising revenue）或使某人無支付力（disabling some individual）等目的而利用民事法院以強索鉅額款項或沒收之情形」，*id.* at 275-76，從而該法院最後仍是維持本案上訴法院的原判。*Id.* at 280. 是故可知，聯邦最高法院已透過該案判決而明確地指出：當政府機關在私人間的民事訴訟中僅是扮演一位單純仲裁者（mere arbiter）的角色時，縱然該賠償金係屬處罰目的之本質者，亦不會因此即觸發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適用到私人間的民事訴訟案件上。Martin, *supra* note 158, at 1664.

¹⁹⁸ Burke v. Deere & Company, 780 F. Supp. 1225 (S.D. Iowa 1991); Spaur v. Owens-Corning Fiberglas Corp., 510 N.W.2d 854 (Iowa 1994); Hoskins v. Business Men's Assurance, 79 S.W.3d 901 (Mo. 2002); Engquist v. Orego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478 F.3d 985 (9th Cir. 2007).

¹⁹⁹ McBride v. General Motors Corp., 737 F. Supp. 1563 (M.D. Ga. 1990).

²⁰⁰ See generally Stevens, *supra* note 77 at 857; Kirgis, *supra* note 77, at 843.

訟案件中，似已非處於如同傳統上單純仲裁者的角色一般，甚而實際上可能造成政府涉入（government involvement）的情事增強，如此即使得懲罰性賠償金不受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所限制的Browning-Ferris乙案見解不斷地受到質疑²⁰¹。於是，民事案件的原告們便經常地以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之規定係與Browning-Ferris乙案所云的該段格言不相一致為由²⁰²，而主張其已應有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適用²⁰³。而關於此種使州政府一般基金或其所設立的特定基金具有收取懲罰性賠償金份額比例之權利的數額分享法令，是否將受到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之限制的爭議問題上，法院通常均以Browning-Ferris乙案所云的上述格言，亦即「政府機關有無起訴該行為」以及「政府機關有無收取該賠償金份額的權利」等要件而進行判斷。然因法院間對此格言的理解不一，從而著重的要件即有不同，進而形成相異的審查重點及其判決結果。

（二）若干法院的判決意見

喬治亞州聯邦地區法院於一九九一年的McBride v. General Motors Corp.²⁰⁴乙案首度審理此等爭議並做出判決意見。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要求該賠償金75%的份額應支付給州政府一般基金的此等規定²⁰⁵，乃係構成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之違反，蓋「假若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

²⁰¹ KIRCHER & WISEMAN, *supra* note 6, § 3:6, at 70-71; James R. McKown, *Punitive Damages: State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14 REV. LITIG. 419, 427 (1995). See generally Ghiardi, *supra* note 36.

²⁰²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21.

²⁰³ See generally Matthew J. Klaben, *Split-Recovery Statutes: The Interplay of the Takings and Excessive Fines Clauses*, 80 CORNELL L. REV. 104, 104 (1994).

²⁰⁴ 737 F. Supp. 1563 (M.D. Ga. 1990).

²⁰⁵ Ga. Code Ann. § 51-12-5.1(e)(2).

額的百分之七十五應支付給該州政府，並使之對該份額部分居於一位判決債權人之地位的此等條款是可被允許維持的話，則將使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法令的民事性質訴訟轉變成係屬為該州政府利益的刑事罰金的法令，而與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相違反」²⁰⁶。換言之，該院將數額分享法令所涉此等憲法疑慮的審查重點放在 **Browning-Ferris** 乙案所云格言「政府機關有無收取該賠償金份額的權利」的要件，亦即該州此等法令是否有賦予州政府收取該賠償金份額的權利存在的問題上，且認為當州政府「一般基金」有此權利時，則將使該賠償金轉變為刑事罰金之性質，並進而使此等法令有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之適用。

然儘管上述 **McBride** 乙案做出如是判決，但多數法院均判決該州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並無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適用。例如，愛荷華州最高法院於一九九四年的 **Spaur v. Owens-Corning Fiberglas Corp.**²⁰⁷ 乙案中即拒絕該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係違反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此種論點，並於判決中說到：「因該州政府既沒有進行該訴訟，亦無企圖為了增加稅收之目的而強索一種高額的罰款，且該分配的賠償金份額亦無混入到州政府的一般基金，而僅是支付給公益基金並專用於特定目的，故該數額分享法令並無適用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²⁰⁸。換言之，該院將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所涉此等憲法疑慮的審查重點放在 **Browning-Ferris** 乙案中所云格言「政府機關有無起訴該行為」、「政府機關有無收取該賠償金份額的權利」等雙重要件，亦即該州此等法令是否有賦予該州政府起訴該行為及收取該賠償金份額的權

²⁰⁶ *McBride*, 737 F. Supp. at 1578.

²⁰⁷ 510 N.W.2d 854 (Iowa 1994).

²⁰⁸ *Spaur*, 510 N.W.2d at 868.

利存在的問題上，並認為當州政府並無起訴該行為，且州政府一般基金亦無收到該賠償金的任何份額時，則此等法令即無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適用²⁰⁹。

此外，二〇〇七年時，第九巡迴法院於Engquist v. Orego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²¹⁰乙案中再度處理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涉及違反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爭議問題。在該案中，原告主張奧勒岡州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要求該賠償金裁決額的60%應支付給刑事傷害補償帳戶的此等規定²¹¹，係構成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之違反²¹²。對此，該法院判決說到：「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僅適用在那些基於懲罰目的而所為的政府行為之上」²¹³，而因本案系爭的數額分享法令並非係為懲罰本案原告，從而並無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適用²¹⁴；其次，該法院亦於判決中附帶地指出：「因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僅是重新分配該賠償金裁決額的一部分給原告而已，且此等法令亦無使被告因此而致有任何的損害存在，從而亦無法支持被告們對之提起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訴訟」²¹⁵。換言之，該法院於本案中並未將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所涉此等憲法疑慮的審查重點放在Browning-Ferris乙案所云的格言之上，而是回到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規範目的，亦即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重新分配該賠償金數額歸屬比例的此等規定，對於原告而言是否係為一種具有處罰目的政府行為？對於

²⁰⁹ See also Hoskins v. Business Men's Assurance, 79 S.W.3d 901, 904 (Mo. 2002).

²¹⁰ 478 F.3d 985 (9th Cir. 2007).

²¹¹ Or. Rev. Stat. § 31.735(1).

²¹² Engquist, 478 F.3d at 999-1007.

²¹³ Id. at 1006.

²¹⁴ Id. at 1006-07.

²¹⁵ Id. at 1006 n.24.

被告而言是否因此而造成任何損害？若非且無者，則此等數額分享法令即無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適用餘地。從而，Engquist乙案中的判決意見做出後，即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並無聯邦過度罰金條款適用的見解提供了另一種堅強的論據。

伍、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發展動向

在已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各州裡，多數法院均已判決該州此等法令並無違憲之有，但因此等法令仍舊存在著是否符合該賠償金制度本身之目的，以及其實施後是否絕無政府涉入與被告正當程序剝奪之情事發生等爭論，故即有論者們提出各種改革或修正的建議方案以試圖解決上述的此些爭議²¹⁶；且儘管聯邦最高法院迄今仍未有針對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所涉的聯邦憲法條款問題予以審理並提出看法，但由於該院在二〇〇七年的Philip Morris乙案中再次審理該賠償金裁決額所涉聯邦憲法正當程序條款爭點時²¹⁷，已有對之進一步做出具體且明確的判決意見，從而即促使論者們以之作為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未來發展的評析依據。

²¹⁶ See generally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21-23;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2-55; Sharkey, *supra* note 30, at 449.

²¹⁷ *Philip Morris*, 127 S. Ct. at 1057. 此外，聯邦最高法院於1990年代開始即陸續審理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所涉的聯邦憲法正當程序條款問題，且迄今已做出八起判決意見。See *Pacific Mut. Life Ins. Co. v. Haslip*, 499 U.S. 1 (1991); *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 509 U.S. 443 (1993); *Honda Motor Co. v. Oberg*, 512 U.S. 415 (1994);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517 U.S. 559 (1996); *Cooper Industries, Inc. v. Leatherman Tool Group, Inc.*, 532 U.S. 424 (2001);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v. Campbell*, 538 U.S. 408 (2003); *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 549 U.S. 346 (2007); *Exxon Shipping Co. v. Baker*, 554 U.S. 471 (2008). 從而可見，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正當程序問題已是備受聯邦最高法院所高度關切的重要事項。

是故，以下即就此等建議方案及Philip Morris乙案後的論者評述予以分析說明之。

一、若干論者的改革與修正建議

從論者們所著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有關文獻中可知，其所提出的改革或修正建議方案主要可區分為兩種思路：其一乃係針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本身的改革，且包括該賠償金制度目的的再概念化以使數額分享法令得以符合該賠償金制度之目的²¹⁸，以及被告正當程序的強化以降低數額分享法令實施下所致生被告正當程序侵害之疑慮²¹⁹；其二則是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本身的改革，且包括排除原告涉入該賠償金訴訟之修正以及治癒性賠償金（curative damages）之替代等方案，以試圖提出同有數額分享制度之益處且亦能夠解決聯邦憲法條款疑慮的相關建議。是故，分述如下：

(一)該賠償金制度目的的再概念化

儘管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目的的通常言說均係指懲罰與嚇阻，但

²¹⁸ See generally A. Mitchell Polinsky & Steven Shavell, *Puni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111 HARV. L. REV. 869, 869 (1998); Sharkey, *supra* note 81, at 347.

²¹⁹ 細究論者們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下的被告正當程序保護改革建議，大致上均與該賠償金制度本身的程序改革相一致。See generally Scott Dodson, *Assessing the Practicality and Constitutionality of Alaska's Split-Recovery Punitive Damages Statute*, 49 DUKE L.J. 1335, 1335 (2000). 因此可知，此些改革建議乃係屬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本身所應為，而非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所應專為，故本文以下即對此部分予以省略。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有論者認為在已有增加政府涉入情形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下，該賠償金制度若係採取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證據標準者，則將更能符合正當程序條款中的公平性概念。See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5.

嚴格來說此雙重目的的各自本身乃隸屬不同之功能，且除有涉及該賠償金制度的法技術規範差異外，尚亦致生其任何改革或配套方案的合目的性爭議²²⁰。因此，近年來論者們即再概念化該賠償金的制度目的以試圖解決此等問題，且現今已有提出兩種無法同時並存的相異模式觀點²²¹：一為傳統概念下的個人利益模式（*individual-interest paradigm*），亦即該賠償金的目的乃係在應報以及用以去懲罰極惡的或冒犯的（*egregious or offensive*）不法行為²²²，且在此應報目的的模式下，該賠償金數額的估算即應限制在懲罰該被告對於個別原告所為不法行為的必要性之上²²³；而另一種則是社會利益模式（*social-interest paradigm*），亦即該賠償金制度是被設計去促進社會的待議事項（*social agendas*），且通常係將焦點放在嚇阻的目的上²²⁴，不過亦可基於諸如公共秩序之維護²²⁵或社會之賠償

²²⁰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目的及美國各州規範現況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戴志傑，同註1，頁55-80。

²²¹ Paul B. Rietema, *Recent Developments: Reconceptualizing Split-Recovery Statutes: 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 127 S. Ct. 1057 (2007), 31 HARV. J.L. & PUB. POL'Y 1159, 1165 (2008). See generally Sharkey, *supra* note 81, at 356-70.

²²² 例如Colby教授指出：「從歷史上來說，應報性的懲罰，即便不是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唯一的，亦是主要的目的」。Thomas B. Colby, *Beyond the Multiple Punishment Problem: Punitive Damages as Punishment for Individual, Private Wrongs*, 87 MINN. L. REV. 583, 628 (2003).

²²³ See *id.* at 629.

²²⁴ 大多數法律經濟分析的學者均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為嚇阻之目的，例如Polinsky與Shavell教授即說到：「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功能應被用以促進最適化嚇阻（*optimal deterrence*），當該不法行為的察覺是低於100%的時候」。Polinsky & Shavell, *supra* note 218, at 874. 又如Rietema教授認為：「從法律與經濟的分析上來說，社會嚇阻目的乃是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上最直接訴求的正當理由」。Rietema, *supra* note 221, at 1165 n.44.

²²⁵ See Michael Finch, *Giving Full Faith and Credit to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Will Florida Rule the Nation?*, 86 MINN. L. REV. 497, 502 (2002).

(social compensation)²²⁶等政策理由而加以正當化，並在此嚇阻目的的模式下，該賠償金數額的估算即可將該被告對本案原告所為範圍以外的損害部分列入考量²²⁷。

而當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係要求該賠償金的部分數額須支付給特定基金並用作公益時，則使個人利益模式的論者提出批判並質疑：為何傳統上係屬個人取向懲罰架構 (individual-oriented punitive framework) 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計算其數額時可將被告對非本案原告所為的損害行為包括在內且將裁決後的數額分享給他人²²⁸？對此，社會利益模式的論者則回應而認為懲罰性賠償金應係一種社會的賠償金 (societal damages) 制度²²⁹，且在此概念下，遭被告不法行為致害的所有受害人均應有權利分得該賠償金的部分數額²³⁰。因此，該論者即倡議各州的立法機關可藉由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立法以重新鑄造並表明其根本目的係為社會賠償或嚇阻 (societal compensation or deterrence)，如此便可使此等收取該賠償金比例數額以設立特定基金並直接用在救濟該不法行為所致特定損害的專門法令，能夠符合該賠償金的制度目的²³¹。此外，該論者亦指出，只要各州的立法機關對於諸如懲罰性賠償金的此種超填補性賠償金 (supracompensatory damages) 制度清楚明確地表達出其係為非應報的，且為一種諸如填補或嚇阻不易被察覺的廣泛損害行為等社會目的的基本理由時，則在此目的下的數額分享

²²⁶ See Sharkey, *supra* note 81, at 389.

²²⁷ *Id.*

²²⁸ See Colby, *supra* note 222, at 608-09.

²²⁹ See Sharkey, *supra* note 81, at 389.

²³⁰ *Id.* at 405.

²³¹ See Sharkey, *supra* note 30, at 476-77.

法令即可不受聯邦最高法院關於正當程序條款上的限制²³²，蓋該院勢必猶豫判決該州立法機關所云的該賠償金上述目的係為一種不合法的州利益（*illegitimate state interest*）²³³。

執此，社會利益模式的論者即認為，假若各州對於某些侵權行為欲制定一種倍數賠償的法令時，有明確地表達出其非屬應報的懲罰且乃係為其他之目的時，則聯邦最高法院將難以違憲之理由而撤銷此些法令²³⁴；且同樣地，儘管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傳統上係為應報的懲罰目的，但當各州欲制定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時，已有清楚表示該賠償金係為一種社會的賠償或嚇阻等目的者，則不僅將可免去聯邦最高法院近年來在該賠償金應報目的下所已建立正當程序條款標準的限制，且亦能一併地解決上述數額分享法令扞格於該賠償金制度目的之疑慮²³⁵。

(二)排除原告涉入該賠償金之訴訟

此建議方案的論者認為，當被告從事惡意、加重或粗暴行為而應課予懲罰性賠償金責任時，該筆賠償金裁決額的受領者應是全體社會而非那些對該賠償金不具任何利害關係的提訴原告²³⁶，故而

²³² Sharkey教授說到：「將此種屬於嚇阻目的的賠償金再概念化為一種社會的賠償金制度，以對抗傳統上的準罰金或處罰目的時，將可倖免於State Farm乙案所聚焦於應報目的下而建立的正當程序條款方面的限制」。Sharkey, *supra* note 81, at 401.

²³³ Sharkey, *supra* note 30, at 477.

²³⁴ *Id.* at 478.

²³⁵ 儘管如此，但當現今多數各州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仍係以傳統上的應報懲罰為主要目的，且尚未修改為嚇阻或其他目的時，則此一爭議問題將仍舊是會持續地存在，尤其是當Philip Morris乙案的判決之後。關於此點，請參本文後述。

²³⁶ James A. Breslo, *Taking the Punitive Damage Windfall away from the Plaintiff: An Analysis*, 86 NW. U. L. REV. 1130, 1148 (1992); Grube, *supra* note 8, at 851.

主張應創設一種完全排除原告涉入該賠償金訴訟的審理制度，且具體建議的作法乃是，法官根據法律之規定以評估該案的系爭不法行為是否應受懲罰性賠償金的請求，若是，則接下來即應由該州政府對該賠償金責任進行訴訟；而當陪審團決定應課予該賠償金時，則該賠償金即應直接裁決給該州所設立且專門支付給受被告系爭不法行為侵害而無法獲取賠償的被害人的特定補償基金²³⁷。換言之，在此建議方案下，即係採取所謂的分開審理（bifurcated trial）制度，第一階段由原告對該案件提起民事訴訟以獲取填補性賠償金，之後在第二階段即由該州政府擔起懲罰性賠償金責任訴訟之任務，且該賠償金應全部直接裁決給特定的補償基金，如此以使原告不曾涉入且擁有過該賠償金。

然此種完全排除原告涉入懲罰性賠償金訴訟的建議方案，係遭受到論者們的強烈批評。蓋其認為此種將原告從懲罰性賠償金訴訟中排除並由州政府為之替代的作法，將使得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原本的民事訴訟程序儼然如同現今既存的刑事訴訟程序審判，從而不必要地模糊了該賠償金在民刑事訴訟間的界線²³⁸。此外，此種要求懲罰性賠償金全部數額均應予以分享的建議方案，亦是貶抑了原告在該案訴訟過程中所已付出的時間、精力、情感及金錢支出，而忽略了該賠償金的誘因機制，且亦是不當地允許州政府與無關的受害人領取該筆賠償金數額也²³⁹。是故，此種僅關注到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公益性格而存有上述內在缺陷與流弊的建議方案，在提出至今仍舊是未受到該國普遍性地支持。

²³⁷ See Breslo, *id.* at 1137-42.

²³⁸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22.

²³⁹ *Id.*

(三)治癒性賠償金制度概念之替代

此建議方案的論者指出，各州實施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真正目的其實僅係在解決該州財政短絀之窘境，而非係為處理該賠償金所致意外之財的問題²⁴⁰；並認為此等數額分享制度的創建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法制來說乃是一種陌生而奇怪的改變，且亦未將原告的需求放置首要以致於不當地忽視權利受害人原本可得之利益²⁴¹。此外，論者亦反問，倘若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唯一目的係為禁止原告獲取意外之財者²⁴²，則為何不將之視為違禁物並直接予以沒入？且又何須將之分享？從而直指各州在制定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之際，事實上亦係有肯認原告個人獲取若干該賠償金數額的重要性²⁴³。是故，論者即提出異於傳統上懲罰救濟且為一種治癒目的的治癒性賠償金概念²⁴⁴，亦即由原告決定懲罰性賠償金所欲分享的額度及其非營利組織並經法院批准的一種賠償金制度，以作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替代方案²⁴⁵。

而此治癒性賠償金制度的精神係在於使原告對該案所裁決的懲罰性賠償金的分享配額及其對象有其選擇的自主權利，從而使之在此自主決定的過程當中得以認識到其作為係正在幫助他人，進而產

²⁴⁰ *Id.* at 1605. *See, e.g.*, Cal. Civ. Code §3294.5(a) (West 2006) (repealed July 1, 2006).

²⁴¹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05.

²⁴² *Smith v. Wade*, 461 U.S. 30, 59 (1983) (Rehnquist, J., dissenting).

²⁴³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05-66.

²⁴⁴ *Id.* at 1587. *See generally* Dede W. Welles, *Charitable Punishment: A Proposal to Award Punitive Damages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9 *STAN. L. & POL'Y REV.* 203, 203 (1998); Nicholas M. Miller, *Tis Better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Charitable Donation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Punitive Damages*, 12 *J.L. & HEALTH* 141, 141 (1998).

²⁴⁵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4.

生治癒其傷害與悲痛的效果，並替代那些對傷害回復毫無意義可言的意外之財的獲取²⁴⁶。至於治癒性賠償金制度概念的具體作法乃是：在陪審團已有認識的情形下，原告提出一份懲罰性賠償金所欲分享之數額及其特定非營利組織且具約束力的契約；而陪審團必須被告知，該所分享的賠償金數額是指定用在社會有益的需要目的上，且不可對該被告產生偏見等指示事項²⁴⁷。此外，論者亦承認治癒性賠償金的制度概念已受到諸多的批評，但其認為假設懲罰性賠償金訴訟已與填補性賠償金訴訟分開審理，且當那些可能使陪審團產生偏見的缺點已被事先處理的話，則該賠償金數額分享的資訊，將不會再使陪審團對被告產生偏見，且亦可預防其做出一份不適當的裁決數額，並甚而可使原告透過此份自主權行使下的數額分享書面，以公開駁斥其是從摯親死亡或自身不幸事件當中而獲取龐大利益的負面批評²⁴⁸。綜上可知，論者認為一份從被告所為不法行為處所課予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應用以增益社會利益之目的，且該賠償金的分享額度及其對象應交由原告來自行決定，如此除了可消除原告獲取意外之財之疑慮外，尚能夠因而助於原告傷害的治癒及增益社會的公共利益，且更為重要的是，亦可一併解決當前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下所生政府涉入疑慮的聯邦憲法條款關切問題²⁴⁹，從而故將之稱為治癒性賠償金也。

然此種由原告自主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額度及其對象的替代方案——治癒性賠償金制度概念，亦受到反對論者所批評並指摘，此建議方案仍舊是一種為使原告具有完全自主權的命令式義務

²⁴⁶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593.

²⁴⁷ *Id.*

²⁴⁸ *Id.*

²⁴⁹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4.

(mandatory obligation)，蓋法院對於原告所決定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比例及其非營利機構仍具有批准之權，從而得以否定或改變原告最初的任何決定也²⁵⁰。此外，本文以為此種治癒性賠償金的替代方案，除了存有上述反對論者所指摘的問題外，其是否真能如同肯定論者所云而可透過陪審團指示事項以排除其偏見之可能？抑或將因此增加更多不當或過度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而引起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訴訟？且更有疑慮的是，此種治癒性賠償金概念乃係從治癒原告傷害目的下而所要求懲罰性賠償金數額須予以分享的一種制度，如此是否將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目的相符合？是否將不當改變該賠償金而使之具有填補損害之目的存在？亦是值得商榷之處。是故，此種基於原告傷害治癒目的而分享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治癒性賠償金制度，因仍存有其自身理論上之困難且亦無法解決現存之問題，從而在提出至今亦是未有受到該國普遍性地支持也。

二、聯邦最高法院Philip Morris案後的評述

儘管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實踐至今已有論者提出「排除原告涉入該賠償金之訴訟」及「治癒性賠償金制度概念之替代」等改革建議，但因此些方案本身仍具上述所云的內在缺陷與流弊可能，故致使其最終依舊未能獲得普遍性的支持；且即便期間已有多數法律經濟分析的權威性論者再概念化懲罰性賠償金的制度目的而提出社會利益模式之觀點，但囿於該賠償金傳統上應報懲罰的個人利益模式見解仍為多數，輔以聯邦最高法院迄今又尚未對此數額分享制度做出判決意見，從而即使得此等數額分享制度的爭論仍舊停留且環繞在其立法正當性的問題上，亦即其是否符合該賠償金的制度目的也。於是，時序進入到二〇〇七年聯邦最高法院在Philip

²⁵⁰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21.

Morris乙案再次對於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正當程序條款問題進一步地做出判決意見後，即有論者援引此判決意見而推斷此數額分享制度的存廢問題並又再次引起論爭。是故，分述如下：

(一)本案事實及判決重點

在Philip Morris乙案中，原告Mayola Williams係一位六十七歲死於肺癌的老煙槍Jesse Williams的遺孀，被告Philip Morris則是一家跨國企業的煙草公司。本案中Williams聲稱Philip Morris公司對於其丈夫死於肺癌的事件上具有過失與詐欺（negligence and deceit），而於一九九七年時向奧勒岡州法院提起訴訟並請求填補性與懲罰性的賠償金²⁵¹。在審理過程中，Williams的律師請求陪審團在裁決被告是否及究應課予多少懲罰性賠償金時，應考慮其在奧勒岡州過去的四十年期間，究竟在此方面已致多少其他相類似受害之人的存在²⁵²。最後陪審團認為Williams先生的死亡確實係因吸煙所造成的，且其之所以吸煙乃係因為確信吸煙係為安全的，而Philip Morris公司明知且虛假地（knowingly and falsely）助長了死者的此一確信，因此即對Philip Morris公司裁決應支付82.1萬元的填補性賠償金，並課予其7,950萬元的懲罰性賠償金。之後，初審法官以該懲罰性賠償金數額過度為由而將之減至3,200萬元²⁵³。對此，兩造當事人均為不服而提起上訴，隨後該州上訴法院拒絕了Philip Morris公司的主張並將之恢復到陪審團原先所裁決的數額²⁵⁴。

²⁵¹ See *Philip Morris*, 127 S. Ct. at 1060.

²⁵² *Id.* at 1061.

²⁵³ *Id.*

²⁵⁴ *Id.* 陪審團於本案中所裁決的填補性賠償金與懲罰性賠償金大約是1：97的數額比例。

於是，Philip Morris公司在向該州最高法院請求複審並遭其拒絕後，即以本案懲罰性賠償金的陪審團指示事項係有錯誤且該裁決額係屬違憲性過度等理由而向聯邦最高法院請求複審，且該院亦將本案發回重審並要求應按照其於State Farm²⁵⁵乙案的判決意見來重新審查²⁵⁶。而奧勒岡州最高法院在複審本案時說到，State Farm乙案雖有禁止懲罰被告的相異損害行為（*dissimilar harms*）或其對州外當事人所為的損害行為（*harms to out-of-state parties*）等言說，但該院並未禁止陪審團去懲罰被告對州內尚未提訴之人所為的相同損害行為，從而在認定Philip Morris公司的系爭不法行為係極具可非難性且已近似於犯罪後，即判決本案懲罰性賠償金與填補性賠償金之間的高額比例性是具有其正當性的，因此最後仍是維持本案原本所裁決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²⁵⁷。於是，在Philip Morris公司的請求後，聯邦最高法院即簽發調閱令（*certiorari*）並再次地審理本案。

而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判決中一開始即重申，在利用懲罰性賠償金以懲罰與嚇阻不法行為方面，各州係具有其合法的利益

²⁵⁵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v. Campbell*, 538 U.S. 408 (2003). 聯邦最高法院於Gore乙案中指出：「一個州沒有任何合法利益或權力去懲罰一位被告當時係屬合法的州外行為」。BMW of North America, 517 U.S. at 572. 是故，不得將被告於州外可能係屬合法的行為作為個案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估算上的基礎。而在State Farm乙案中，該院進一步闡明：「一個州在施加懲罰性賠償金以懲罰一位被告於該州以外所構成的不法行為方面，亦不具有一種合法的利害關係」；且亦說到：「一位被告的相異行為（*dissimilar acts*）不得作為懲罰性賠償金裁決上的基礎」，*State Farm*, 538 U.S. at 421-22. 因此，在裁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時，被告所有的州外損害行為，以及相異的損害行為，不論合法與否，均不得作為其計算上的基礎。

²⁵⁶ *Philip Morris*, 127 S. Ct. at 1061-62.

²⁵⁷ *Williams v. Philip Morris Inc.*, 127 P.3d 1165, 1176, 1181 (Or. 2006).

(*legitimate interest*) 存在，但亦必須在此些利益與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潛在不公平或恣意等特性之間加以權衡；且在權衡此些相互排斥的事項上，正當程序條款即有強制程序上的要求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以及過度性的司法審查 (*excessiveness review*)²⁵⁸。接著，該院即一改常態地而將本案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過度性司法審查問題擱下，並把焦點放在程序的正當程序的憲法要求上，且說到：「正當程序條款禁止各州利用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以懲罰被告對非本案當事人 (*nonparties*) 所為的損害行為」²⁵⁹，蓋其認為在此種作法下所為的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不但將是排除了被告在未來他案中提出所有可能抗辯的能力 (*ability to present every available defense*)，且亦可能引進一種無標準的範圍 (*standardless dimension*) 到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計算上，進而導致陪審團去推測非本案當事人的數量以及對此些非本案當事人所為損害行為的程度²⁶⁰。因此，該院即以本案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已不適當地考慮到被告對非本案當事人所為的損害行為而違反程序上的正當程序為由，最後撤銷奧勒岡州最高法院之判決並發回重審²⁶¹。

²⁵⁸ See *Philip Morris*, 127 S. Ct. at 1062-63.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裁決的程序上正當程序，See, e.g., *Honda Motor Co. v. Oberg*, 512 U.S. 415 (1994); *Cooper Indus. v. Leatherman Tool Group, Inc.*, 532 U.S. 424 (2001). 至於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的實質上正當程序，亦即過度性審查，則係採取「可非難性程度」、「數額比例性」及「可比較行為之處罰」等三項檢驗標準，See *BMW of North America*, 517 U.S. at 574-85.

²⁵⁹ *Philip Morris*, 127 S. Ct. at 1063.

²⁶⁰ See *id.* at 1063-64. 不過，須特別指出的是，該院於本案判決中亦有說到，陪審團在決定被告不法行為的可非難性程度是否應課予懲罰性賠償金責任時，是可斟酌被告所致非本案當事人的損害行為在內。*Id.* at 1064.

²⁶¹ See *id.* at 1065-66.

(二)本案判決對數額分享制度之影響

由於聯邦最高法院於Philip Morris乙案中明確指出，在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的規範下，各州不應利用懲罰性賠償金以懲罰一位被告施加在州內非本案當事人（in-state nonparties），亦即尚未出現在法院面前的潛在原告們身上的損害行為²⁶²，從而意味著在裁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時，僅可考慮該被告對本案原告所造成的損害，而不得將其對第三人的損害（third-party harms）作為系爭案件上該賠償金的估算基礎²⁶³。於是，此等見解一出即再次觸發論者們關注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正當性及其存廢問題²⁶⁴。

對此，主張廢除數額分享制度的論者認為，聯邦最高法院於Philip Morris乙案中言明禁止第三人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估算因素的目的，乃係為使被告獲得公平審判（fair trial），亦即被告對於本案原告以外的任一受害人均應保有其對之訴訟上的抗辯機會，方才不允許原告可在系爭案件中從被告對非本案原告所為的不法行為上獲得任何或因此增加的該賠償金數額²⁶⁵。因此可知，該院的此等判決意見乃係在正當程序條款對被告訴訟權保障之要求下而所為，如此即可顯見該院已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屬一種個人取向的懲罰架構（individual-oriented punitive framework），進而將使社會利益模式中的任何目的便不復存在，亦即各州已不可再利用

²⁶² Rietema, *supra* note 221, at 1160.

²⁶³ Rabe, *supra* note 18, at 354.

²⁶⁴ 聯邦最高法院於Philip Morris乙案中揭示「禁止第三人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估算的基礎」的此等見解，除了引起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論爭外，其背後主要目的係為了解決長期紛擾的「大規模侵權行為下的多重懲罰性賠償金裁決問題」也。對此，有待日後再為文論述。

²⁶⁵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23.

該賠償金制度以促進傳統上所設想的社會最佳嚇阻（socially optimal deterrence）或社會賠償（social compensation）等目的²⁶⁶。執此，廢除論者即表示，儘管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並不必然地拴緊在社會利益模式之下，但因實踐上各州法院通常均以此或結合此目的而作為該制度的正當化理由或直覺式訴求²⁶⁷，從而在Philip Morris乙案的判決格言出現後，那些主張懲罰性賠償金再概念化為一種社會賠償並立法明文於數額分享法令的此種建議方案，將是不切實際且不適當的，蓋其最終仍是無法滿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要求，且亦與聯邦最高法院所云該賠償金係屬應報懲罰之目的有違也²⁶⁸。是故，廢除論者即認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在Philip Morris乙案後應重新斟酌其存在的正當性²⁶⁹。

²⁶⁶ Rietema, *supra* note 221, at 1166.

²⁶⁷ *Id. See, e.g.,* DeMendoza v. Huffman, 51 P.3d 1232, 1238 (Or. 2002); Dardinger v. Anthem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781 N.E.2d 121, 145 (Ohio 2002).

²⁶⁸ Michael P. Allen, *Of Remedy, Juries,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ip Morris v. Williams*, 63 N.Y.U. ANN. SURV. AM. L. 343, 352 (2007); Mervine, *supra* note 33, at 1623. 對此，主張社會利益模式的Sharkey教授亦回文說到，這些批評論者的見解似乎未有看到或未完全體會到其主張與Philip Morris乙案判決格言的關鍵性不同點，亦即聯邦最高法院的此一格言係以懲罰性賠償金為應報目的之前提，方才認為應報的懲罰應限制在朝向個別原告所為的損害行為之上，然該院並未有考慮到該賠償金亦可能係在一種非應報且為社會賠償之目的而存在。Sharkey, *supra* note 30, at 477. 從而，Sharkey教授認為只要立法者在制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時有明文該賠償金制度係為嚇阻或社會賠償等目的者，即仍舊可使數額分享法令具有其正當性，且亦不會因Philip Morris乙案的判決格言而受到影響。Sharkey, *supra* note 30, at 478. Accord Thomas B. Colby, *Clearing the Smoke from Philip Morris v. William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unitive Damages*, 118 YALE L.J. 392, 477 (2008).

²⁶⁹ Rietema, *supra* note 221, at 1166.

此外，儘管如此，但廢除論者亦退一步地說到，雖然Philip Morris乙案判決禁止以社會受損（social-harm）為由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而影響著當前數額分享法令的正當性，但此並非意味著各州即須全然地放棄此等法令，蓋其仍可以個人受損（individual-harm）為由而合憲地施加限制於該賠償金數額之上以使該法令具有正當性也²⁷⁰。換言之，在以個人受損為由下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究竟什麼是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令人信服的正當理由而可使「施加損害於本案原告的該不法行為」所課予的該賠償金數額，得以適當地分享給該州政府或特定基金？即是各州此等法令須清楚說明的重點所在。例如，各州可明確地表達基於稅收利益或阻止某些不受歡迎的訴訟（disfavored lawsuits）等理由而正當化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²⁷¹。不過，廢除論者最後仍是認為，當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已陸續建構正當程序條款之限制，且在未有包括本案原告以外損害在內的該賠償金數額已不太可能出現重複裁決等情形下，該賠償金的過度裁決或側目的意外之財將可獲得適當的解決。換言之，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之主要目的係為解決原告獲取意外之財之問題，然當該賠償金制度逐漸落實正當程序條款之限制，且對該賠償金數額計算去採取一種個人損害架構（individual-harm framework）及最高限額立法時，則將抹去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在解決意外之財的此一根本基礎²⁷²。執此，在懲罰性賠償金現今此些改革配套措施之實行下，已使得當前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的立法理由更顯得模糊不清，從而致使此等法令未來勢必須重新斟酌，其結果不是廢除此等法令，就是對之再概念化

²⁷⁰ *Id.* at 1167.

²⁷¹ *Id.*

²⁷² Rietema, *supra* note 221, at 1168.

其立法之目的²⁷³。

陸、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綜合評述 ——代結論

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九〇年代初期即隨著各州侵權行為法的改革運動而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並制頒相應的立法，且無論是在實體抑或是程序法方面，其目的大多均是在處理該賠償金過度裁決之問題。然其中較為特殊且相異目的的法史創建與立法即是，專為解決該賠償金「相稱數額」下所生原告獲取意外之財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也²⁷⁴。從而，以下分就上述各章節的大篇幅內容予以綜合分析與評述，以為本文議題最後研究成果的呈現與結論：

一、公共政策之評估

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公共政策方面，主要係為了解決原告在該賠償金相稱數額下所獲「真正」意外之財的疑慮也。從而，此等數額分享法令目的所稱的「意外之財」，嚴格言之，非謂指填補性賠償金以外的全部數額，而應係為懲罰性賠償金目的實踐下對被告因此所課並使原告從而獲得該賠償金的過多數額；且在保留懲罰性賠償金之金錢誘因機制下，此等過多範圍的數額計算應不包含合理的激勵金額在內，以免侵蝕該賠償金在鼓勵私人執行法律

²⁷³ *Id.*

²⁷⁴ 蓋若非為相稱數額者，則其所生的意外之財即將含有過度裁決範圍的數額在內，故應屬該賠償金過度裁決所應處理，而非數額分享制度所欲解決的問題。因此，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解釋上應係在解決「相稱數額」下的原告意外之財的問題。

方面的實踐效力。是故，究應如何在相稱但確屬鉅額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中，一方面保留合理範圍的金錢誘因數額給原告及其律師，以落實該賠償金在鼓勵其積極面對訴訟揭露不法的實效；且在另一方面將該賠償金的剩餘部分分享給社會大眾，以解決原告因此所獲過多真正意外之財的問題，並使該賠償金能夠更加符合其社會公益之性格，甚而亦能因而減少訴訟資源的浪費及政府財政的負擔，則是該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得以存在且具其價值性之所在。

而儘管此等數額分享制度確具上述所言之優點，但其仍將可能出現如同反對者所云激起該賠償金失控與更多訴訟紛爭、誘引法官們違反應有的職業倫理、惡化原告與其律師間之利益衝突、增強政府涉入或強索私人之財產等負面情事，而增加該賠償金裁決額在聯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方面的訴訟。因此，在諸如陪審團審理、法官選舉、律師勝訴報酬金等相關法制及跨州訴訟、訴訟手段規制等環境背景下，該國各州究應如何在規劃與實施此等數額分享法令時，避免造成該賠償金過度裁決及其他負面的結果，即是其應努力解決的方向與工作，且若無法克服而仍係弊大於利之可能者，則在立法選擇下即應予以放棄。此點，或許即為半數以上各州未有實施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之原因所在也。是故，立於比較法的研究角度以言，本文僅能提出此等數額分享制度之公共政策論爭並持續對其發展狀況予以觀察，而著實無法且亦不能予以過度批評或任何建言也。

二、規範內容之比較

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規範內容方面，各州此等法令乃係呈現多樣化的面貌，且規範技術上大致可區分為適用類型、法律性質、分享對象、分享比例以及律師與相關訴訟費用之處理等五種態樣：

(一)在適用類型方面有一般侵權行為與特殊侵權行為等區分，且已有十一個州的此等法令係採取前者之立法，亦即所有類型的侵權行為訴訟所課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均應予以分配之謂，而其中較為特殊的是愛荷華州，其規定當被告不法行為係特別針對原告時，儘管仍屬一般侵權行為的訴訟類型，但該賠償金仍不予以分配，反之，則分配；至於後者的立法模式則僅有三個州採取之，且僅有出現在產品責任、醫療疏失及保險人惡意拒絕理賠等訴訟類型而已。是故，儘管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究應適用於何種侵權訴訟類型一事乃屬立法選擇之問題，但可知的是，立於此等法令在解決原告所獲真正意外之財、落實該賠償金社會公益性格以及充實政府國庫等目的以言，似應使一般侵權行為所生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均予分享，故而即成為多數各州所共同採納的立法模式也。

(二)在法律性質方面有強制性與任意性等區分，並已有十三個州的此等法令係採取前者之立法，亦即懲罰性賠償金是否予以分配乃屬強制之性質而不容法院按具體個案情狀以裁量判斷之謂，且其中較為特殊的是紐約州，其明文禁止對於政府機關所被課予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予以分配；至於後者的模式僅有俄亥俄州因當初係以判決方式行之，從而成為唯一採取任意性的州。是故，儘管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究應採取何種法律性質一事乃屬立法選擇之問題，但可知的是，採取強制性的模式將可使此等法令的適用更具其明確性且亦得避免法院的恣意性，故而即成為多數各州所共同採納的立法模式也。

(三)在分享對象方面有一般基金與特定基金等區分，且已有七個州的此等法令係採取前者之立法，亦即懲罰性賠償金所分享的數額應支付至政府國庫之謂，從而足顯其目的乃係在提供稅收來源之新

管道以充實政府國庫也²⁷⁵。不過，亦有六個州係採取後者之立法，亦即懲罰性賠償金所分享的數額應支付至特定的公益基金並專款專用之謂，從而顯示其乃係為促進特定社會利益之目的而所生之立法也，且其中較為特殊的有佛羅里達州，其規定人身傷害或不當致死訴訟案件應分享給公共醫療援助信託基金，至於其他侵權案件則應分享給一般收入基金，從而成為唯一按侵權行為類型以兼採兩種分享對象的州；而奧勒岡州則特別規定，若該勝訴當事人係為政府實體時，則該分享的份額即應支付給一般基金，若非，則應分享給刑事傷害補償帳戶，從而即成為唯一按勝訴當事人身份以異其分享對象的州。是故，無論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分享對象究係採取何種模式，但總的來說，政府國庫均得因此等法令而積極地增加歲入或消極地減少歲出，而其最大的差異則係在於特定基金模式較能彰顯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本身的社會性格且落實特定的公益目的，甚而亦較可避免政府涉入等方面的聯邦憲法條款爭議問題也。

(四)在分享比例方面有固定與裁量比例等區分，且已有十一個州的此等法令係採取前者之立法，亦即懲罰性賠償金究應分享多少數額比例乃屬固定之謂，且其中從20%到75%均有採之；而僅有三個州係採取後者之模式以允許法院得按具體個案情狀裁量數額分享之比例，且其中較為特殊的有伊利諾州，其特別規定分配給原告律師的份額應是合理且不應考慮到律師勝訴報酬金契約之部分；至於愛荷華州則特別規定，僅限被告不法行為非係具體朝向原告的一般侵權行為時方有適用，且法院裁量給原告的份額至多是該賠償金數額的25%而已。是故，儘管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分享比例究應採取何種模式以及若採取固定比例模式時又應分享多少比例乃屬立法裁量之問題，但可知的是，此等分享比例的規劃得當與否，將在在影響

²⁷⁵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36.

到該賠償金提訴之可能及紛爭案件和解之機會並左右著此等法令的適用及其實效也。

(五)在已有明文關於律師及相關訴訟費用的處理問題方面，則有六個州採取「先扣除，再按比例分配」以及各一個州分別採取「先按比例分配，再從基金份額中扣除」與「先按比例分配，再從原告份額中扣除」等計算模式。對此，舉例說明如下：假設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為120萬元，律師費用為60萬元，則在採取「先扣除，再按比例分配」的喬治亞州法令規定下，120萬元須先扣除60萬元的律師費用，剩餘的60萬元則按政府國庫75%、原告25%的數額比例予以計算，從而最後結果為原告律師獲得60萬元、政府國庫分得45萬元、原告僅取得15萬元，因此足見此種模式係對原告律師之利益最大之保障也。而在採取「先按比例分配，再從基金份額中扣除」的俄亥俄州Dardinger乙案的判決要求下，應先行計算原告及特定基金各自分得的數額比例，亦即原告取得該賠償金的三分之一，即40萬元，而特定基金分得該賠償金的三分之二，即80萬元，之後再從特定基金的80萬元中扣除60萬元的律師費用，從而最後結果為原告律師獲得60萬元、原告取得40萬元、特定基金僅分得20萬元，因此足見此種模式得以保障到原告及其律師的利益，但對基金財源的籌措最為不利也。而在「先按比例分配，再從原告份額中扣除」的奧勒岡州法令規定下，應先行計算原告及基金各自分得的數額比例，亦即特定基金分得該賠償金的60%，即72萬元，而原告則取得該賠償金的40%，即48萬元，之後再從原告份額中扣除律師費用且不得超過該份額的20%，從而最後結果為特定基金分得72萬元、原告取得38.4萬元、原告律師最多僅獲得9.6萬元，因此足見此種模式將對基金財源的籌措最為有利，但卻使原告律師之利益獲得最少之保障也。是故，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計算時，關於律師及相關訴訟費用的處理究應採取何種模式，乃涉及到原告、原告律師及基金財源

三者間利益之分配，且亦將影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實踐也。對此，立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激勵作用以鼓勵律師積極協助原告提訴而揭露不法的角度以言，似應採取「先扣除，再按比例分配」的作法，故而即為多數各州所共同採納的立法模式也。

三、違憲疑慮之解決

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司法審查方面，除了此等法令實施後所可能造成該賠償金過度裁決而引起聯邦憲法正當程序條款之疑慮外，其法令本身已遭受到聯邦憲法徵收條款、平等保護條款及過度罰金條款之訴訟，且多數各州法院亦均對之做出合憲判決而僅有少數零星個案有做出其違憲之判決意見。是故，如何從此些聯邦憲法條款爭議之判決中分析並提出違憲疑慮解決的此等法令，即屬重要之事。從而，分析如下：

首先，在聯邦憲法徵收條款的爭議問題上，因聯邦最高法院於一八九八年McCollough乙案中指出「立法機關不得徵收一個已被判決所既定的財產權」，且在一九七二年Roth乙案亦判決說到「財產權之創設及其範圍，並非係由聯邦憲法而是由州法的現行規則或共議所加以確定」，故各州法院在審查此等法令的此一憲法條款爭議時，即將重點放在「原告對該案的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具有財產權利」之問題上。對此，多數各州均以懲罰性賠償金不具權利性格，以及原告在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前」對該賠償金不存有任何既定財產權等理由而判決此等法令並無構成違憲徵收；然唯獨科羅拉多州在一九九一年Kirk乙案中以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後」原告已對該賠償金存有既定財產權為由而宣告該州此等法令係屬違憲。執此，在細究此相異結果之判決意見及其所審查的各州此等法令後可知，僅有科羅拉多州的此等法令係規定原告在獲得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後再去提交」其中份額至一般基金之中而異於多數各州的此等法令規

定，因此方致其遭受違憲的判決結果。是故，為避免此等法令再生違憲徵收之疑慮，關於法院做出懲罰性賠償金分享份額的時間點即屬重點之所在²⁷⁶，故其具體可行的因應作法或規定可為：在判決書中明確說明原告對本案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哪一部分具有財產權利，亦即同時指明原告與基金各自於該賠償金中所分得的份額²⁷⁷，且要求被告應將該賠償金全額直接提交到法院書記處而非支付給原告，並再由該處按各自份額予以分配²⁷⁸，如此將可使原告對該賠償金不曾存有既定財產權，進而得以完全杜絕此等法令於違憲徵收上之疑慮也。

其次，在聯邦憲法平等保護條款的爭議問題上，因聯邦最高法院對此條款長久以來已認為當系爭法令或政府行為既無涉及到可疑分類亦無影響到基本權利時，即應以「合理基礎審查標準」對之進行合憲性審查，故各州法院在審查此等法令的此一憲法條款爭議時，即將重點放在「此等法令對於一般侵權與特定侵權訴訟類型之差別對待與合法的政府利益之間，是否具有合理關聯性存在」之問題上。對此，所有的各州法院均認為該州此等法令係為剝奪原告意外之財、鼓勵和解並減少訴訟負擔等目的而具有合法的政府利益存在，從而判決其並無違反平等保護條款。換言之，在關於此等法令是否存有合法政府利益的判斷上，幾乎所有法院均會無條件地遵從於該州立法機關的決定²⁷⁹。因此，為避免特定訴訟類型下的此等法令再生平等保護條款違反的疑慮，立法機關在對於特定訴訟類型

²⁷⁶ See Rabe, *supra* note 18, at 347.

²⁷⁷ Martin, *supra* note 158, at 1666; Schwartz, Behrens & Silverman, *supra* note 3, at 553. See, e.g., *Fust v. Attorney General*, 947 S.W.2d 424, 431 (Mo. 1997); *DeMendoza v. Huffman*, 51 P.3d 1232, 1247 (Or. 2002).

²⁷⁸ *Stepanian II*, *supra* note 8, at 316. See, e.g., Ind. Code Ann. § 34-51-3-6.

²⁷⁹ Kirgis, *supra* note 77, at 856 n.90.

的懲罰性賠償金欲規定數額分享制度時，即應於立法理由中清楚明確地說明其合法的政府利益究屬為何，且當與該差別對待間具有某程度的合理關聯性時，便可解決此一憲法條款上之爭議也。

再者，在聯邦憲法過度罰金條款的爭議問題上，因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八九年 **Browning-Ferris** 乙案中指出：「當政府機關既未起訴該行為，且亦無收取該賠償金其中份額的任何權利時，則在民事訴訟案件中的金錢賠償裁決即不受到過度罰金條款之限制」，從而各州法院在審查此等法令的此一憲法條款爭議時，即將重點主要放在「政府機關有無收取該賠償金份額之權利」的問題上。對此，多數各州均以此等法令並無此等情事存在為由而判決並無此等憲法條款的適用；然唯獨喬治亞州聯邦地區法院一九九一年 **McBride** 乙案以具有此等情事為由而做出相異性的判決。執此，在細究此相異結果的判決意見及其所審查的各州此等法令後可知，僅有喬治亞州的此等法令係要求該賠償金所分享的份額應支付至州政府的一般基金而異於其他判決所審理的該法令規定，因此方才致其遭受此等判決之結果。是故，為避免此等法令再生此一憲法條款之疑慮，關於該賠償金份額分享對象的規劃即屬重點之所在，亦即將之分享給特定公益基金而非政府的一般基金者，即可使政府機關不具有收取該賠償金份額之權利，從而得以解決此等法令於此憲法條款上之疑慮也²⁸⁰。

²⁸⁰ 此外，即便該賠償金分享的對象係為政府一般基金時，亦不必然地就有此一憲法條款的適用。對此，或許第九巡迴法院2007年 **Engquist** 乙案的判決理由係可供支持的論據，亦即此等法令僅是重新分配該賠償金裁決額的一部分給原告，且亦無因此使被告致有任何損害之存在也。 *Engquist*, 478 F.3d at 1006 n.24.

四、發展動向之觀察

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發展動向方面，因此等數額分享法令仍存有上述所云實踐下的疑慮，故論者們即提出相關改革與修正，其中除了針對該賠償金制度目的再概念化以及其裁決額所涉正當程序條款之問題外，對於此等數額分享制度本身亦提出了排除原告涉入該賠償金審理以及治癒性賠償金概念替代等建議方案。然因此種排除原告並由州政府擔起該賠償金訴訟且要求該賠償金全額分享的建議方案，僅有關注意到該賠償金制度的公益性格，而不必要地模糊了該賠償金在民刑事訴訟間的界線，且亦忽略了該賠償金的誘因機制，甚而也無助於被告正當程序侵害可能的改善，並又將可能產生政府涉入的過度罰金條款之問題；而在此種賦予原告對該賠償金的分享配額及其對象具有自主權利的治癒性賠償金替代方案上，因其實踐上仍舊無法使原告具有充分選擇的自主權利，且亦無法解決懲罰性賠償金裁決額所致被告正當程序侵害的疑慮，甚而又與該賠償金的制度目的相違背。因此，在此些建議方案本身仍存有其內在缺陷與流弊，並又無法完全解決數額分享制度所生問題等情形下，故而於該國迄今均未獲得普遍性地支持，且可預見的是其未來的發展亦復如是也。

此外，儘管上述的立法改革建議方案未有獲得青睞，但因聯邦最高法院於二〇〇七年Philip Morris乙案中做出「禁止將第三人損害作為系爭案件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估算基礎」的判決意見，從而使得論者們即將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存廢問題轉向於其立法正當性的戰場上。於是，廢除論者以該判決意見而認為該院已肯認該賠償金係為一種個人取向的懲罰架構，並因而直指社會利益模式下的數額分享制度應不具有其立法的正當性也；且其亦退步言之而說到，即便係採取個人受損模式的數額分享制度，但在隨著該賠

償金裁決額於正當程序條款方面的司法改革以及其最高限額的立法改革活動下，將除去其在解決原告獲取意外之財方面的立法根本基礎也。對此，支持論者則以該判決意見係在懲罰性賠償金為應報懲罰目的之前提下所做出而予以回應，並指摘該院與廢除論者並未有考慮到該賠償金亦可能是一種非應報且為社會賠償目的的制度也。從而，支持論者認為只要立法者在制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時，明文該賠償金制度係為嚇阻或社會賠償等目的者，即可使該賠償金數額分享法令具有其立法的正當性，且將不受Philip Morris乙案的判決格言所影響。執此可知，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立法正當性，實涉該賠償金制度本身的目的究屬為何之問題也。而此爭議之肇因或許即是該賠償金制度於普通法上的歷史發展，及將之立法當時未有明確說明且往往予以統稱「懲罰與嚇阻」之目的而所致之結果。從而，如何重新理解並再概念化懲罰性賠償金的制度目的，並使數額分享法令與該賠償金制度之目的相符合，且明確說明該數額分享法令的立法目的並使之不再侷限於原告意外之財的剝奪上，或許即是一種有益且值得持續觀察的發展動向也。

綜上，儘管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迄今於該國未有受到普遍青睞，且實踐上仍舊存有諸多之疑慮，而似乎不應引進於我國法制之中，但若細究其成效不彰之原因後不難發覺，是為其諸如陪審團審理、法官選舉、律師勝訴報酬金等相關法制及跨州訴訟、訴訟手段規制等環境背景所致之結果也。從而，當我國並無諸如該國上述之相關法制與環境背景的情形下，如何擷取該國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的益處，並妥善規劃我國此等制度的立法技術，而得以充實現今立法在即的消費者保護基金之財務經費，即是研究與立法上應有的方向。因此，囿於篇幅，本文僅能完整介紹與分析美國法上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至於如何從中借鑑以提出我國法上專有的此一數額分享制度，則僅能於日後再行為文論述之。

參考文獻

一、中 文

1. 林德瑞，論懲罰性賠償，中正法學集刊，1期，頁25-66，1998年7月。
2. 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31卷5期，頁163-219，2002年9月。
3. 戴志傑，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基礎問題研究，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7月。
4. 謝哲勝，懲罰性賠償，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30卷1期，頁113-161，2001年1月。

二、外 文

1. Allen, Michael P., *Of Remedy, Juries,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ip Morris v. Williams*, 63 N.Y.U. ANN. SURV. AM. L. 343 (2007).
2. 2 Am. Law Inst. (1991). REPORTERS' STUDY,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FOR PERSONAL INJURY, APPROACHES TO LEGAL INSTITUTIONAL CHANGE. PA: American Law Institute.
3. Behrens, Mark A. & Silverman, Cary, *The Case for Adopting Appointive Judicial Selection Systems for State Court Judges*, 11 CORNELL J.L. & PUB. POL'Y 273 (2002).
4. Breslo, James A., *Taking the Punitive Damage Windfall away from the Plaintiff: An Analysis*, 86 NW. U. L. REV. 1130 (1992).
5. Colby, Thomas B., *Beyond the Multiple Punishment Problem: Punitive Damages as Punishment for Individual, Private Wrongs*, 87 MINN. L. REV. 583 (2003).
6. Colby, Thomas B., *Clearing the Smoke from Philip Morris v. William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unitive Damages*, 118 YALE L.J. 392 (2008).
7. Denmark, Howard A., *Seeking Greater Fairness When Awarding Multiple Plain-*

- tiffs Punitive Damages for a Single Act by a Defendant*, 63 OHIO ST. L.J. 931 (2002).
8. Dodson, Scott, *Assessing the Practicality and Constitutionality of Alaska's Split-Recovery Punitive Damages Statute*, 49 DUKE L.J. 1335 (2000).
 9. Evans, Benjamin F., "Split-Recovery" Survives: *The Missouri Supreme Court Upholds the State's Power to Collect One-Half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63 MO. L. REV. 511 (1998).
 10. Finch, Michael, *Giving Full Faith and Credit to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Will Florida Rule the Nation?*, 86 MINN. L. REV. 497 (2002).
 11. Ghiardi, James D., *Punitive Damages: State Extraction Practice is Subject to Eighth Amendment Limitations*, 26 TORT & INS. L.J. 119 (1990).
 12. Gotanda, John Y., *Punitive Damag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42 COLUM. J. TRANSNAT'L L. 391 (2004).
 13. Grube, E. Jeffrey, *Punitive Damages: A Misplaced Remedy*, 66 S. CAL. L. REV. 839 (1993).
 14. Hellend, Eric & Tabarrok, Alexander, *The Effect of Electoral Institutions on Tort Awards*, 4 AM. L. & ECON. REV. 341 (2002).
 15. Jeffries, John Calvin, Jr., *A Comment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Punitive Damages*, 72 VA. L. REV. 139 (1986).
 16. Keeton, W. Page et al. (1984). PROSSER & KEETON ON THE LAW OF TORTS. St. Paul, Minn.: West Pub. Co.
 17. Kircher, John J. & Wiseman, Christine M. (2000). PUNITIVE DAMAGES: LAW AND PRACTICE (2d ed.). St. Paul, Minn.: West Group.
 18. Kirgis, Paul 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e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50 WASH. & LEE L. REV. 843 (1993).
 19. Klaben, Matthew J., *Split-Recovery Statutes: The Interplay of the Takings and Excessive Fines Clauses*, 80 CORNELL L. REV. 104 (1994).
 20. Lee II, James E., *Mack Trucks, Inc. v. Conkle: The Georgia Supreme Court Tells the Legislature to Keep on Truckin' When Appropriating Punitive Awards to the State Treasury*, 45 MERCER L. REV. 1439 (1994).

21. Mann, Kenneth, *Punitive Civil Sanctions: The Middleground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Law*, 101 YALE L.J. 1795 (1992).
22. Martin, C. J., *Casenote: Dardinger v. Anthem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Judicial Redistribu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40 SAN DIEGO L. REV. 1649 (2003).
23. McKown, James R., *Punitive Damages: State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14 REV. LITIG. 419 (1995).
24. Mervine, Leah R., *Bridging the “Philosophical Void” in Punitive Damages: Empowering Plaintiffs and Society Through Curative Damages*, 54 BUFFALO L. REV. 1587 (2007).
25. Miller, Nicholas M., *Tis Better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Charitable Donation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Punitive Damages*, 12 J.L. & HEALTH 141 (1998).
26. Nielsen, Jessica, *A True Hollywood Story: Alternative Distributions and the Ohio Supreme Court’s Dardinger v. Anthem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72 U. CIN. L. REV. 815 (2003).
27. Olson, Walter K. (1991). *THE LITIGATION EXPLOSION: WHAT HAPPENED WHEN AMERICA UNLEASHED THE LAWSUIT*. New York: Truman Talley Books-Dutton.
28. Owen, David G.,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in Product Liability Litigation: Strong Medicine or Poison Pill?: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39 VILL. L. REV. 363 (1994).
29. Pace, Kimberly A., *Recalibrat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through National Punitive Damage Reform*, 46 AM. U. L. REV. 1573 (1997).
30. Polinsky, A. Mitchell & Shavell, Steven, *Puni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111 HARV. L. REV. 869 (1998).
31. Priest, George L., *Punitive Damages Reform: The Case of Alabama*, 56 LA. L. REV. 825 (1996).
32. Rabe, Bethany,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plit-Recovery Punitive Damage Statutes: Good Policy but Bad Law*, 2008 UTAH L. REV. 333 (2008).

33. Rietema, Paul B., *Recent Developments: Reconceptualizing Split-Recovery Statutes: 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 127 S. Ct. 1057 (2007), 31 HARV. J.L. & PUB. POL'Y 1159 (2008).
34. 2 Rotunda, Ronald D. & Nowak, John E. (1992). TREATISE ON CONSTITUTIONAL LAW: SUBSTANCE AND PROCEDURE (2d ed.). St. Paul, Minn.: West Pub. Co.
35. Rustad, Michael L., *Access to Justice: Can Business Co-Exist with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 The Closing of Punitive Damages' Iron Cage*, 38 LOY. L.A. L. REV. 1297 (2005).
36. 1 Schlueter, Linda L. (2005). PUNITIVE DAMAGES (5th ed.). MA: Matthew Bender & Co.
37. Schwartz, Victor E. & Behrens, Mark A., *Punitive Damages Reform—State Legislatures Can and Should Meet the Challenge Issu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alsif*, 42 AM. U. L. REV. 1365 (1993).
38. Schwartz, Victor E., Behrens, Mark A. & Mastro Simone, Joseph P., *Reining in Punitive Damages “Run Wild” : Proposals for Reform by Courts and Legislatures*, 65 BROOK. L. REV. 1003 (1999).
39. Schwartz, Victor E., Behrens, Mark A., Silverman, Cary & Tedesco, Rochelle M.,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Legal Marketplace: A Legal Consumer's Bill of Rights is Needed*, 15 LOY. CONSUMER L. REV. 1 (2003).
40. Schwartz, Victor E., Behrens, Mark A. & Silverman, Cary, *I'll Take That: Legal and Public Policy Problems Raised by Statutes That Require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to be Shared with the State*, 68 MO. L. REV. 525 (2003).
41. Sharkey, Catherine M.,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113 YALE L.J. 347 (2003).
42. Sharkey, Catherine M., *Federal Incursions and State Defiance: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Wake of Philip Morris v. Williams*, 46 WILLAMETTE L. REV. 449 (2010).
43. Shores, Janie L., *A Suggestion for Limited Tort Reform: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to Eliminate Windfalls*, 44 ALA. L. REV. 61 (1992).

44. Stepanian II, Leo M., *The Feasibility of Full State Extrac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32 DUQ. L. REV. 301 (1994).
45. Stevens, Clay R., *Split-Recovery: A Constitutional Answer to the Punitive Damages Dilemma*, 21 PEPP. L. REV. 857 (1994).
46. Tabarrok, Alexander & Hellend, Eric, *Court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ort Awards*, 42 J.L. & ECON. 157 (1999).
47. Welles, Dede W., *Charitable Punishment: A Proposal to Award Punitive Damages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9 STAN. L. & POL'Y REV. 203 (1998).
48. White, Patrick,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Split Recovery Statutes and Their Validity as a Tool of Modern Day "Tort Reform"*, 50 DRAKE L. REV. 593 (2002).

A Study on the Split-Recovery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under U.S. Laws

Chih-Chieh Tai^{*}

Abstract

Since damaging events caused by defective produc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umers' Foundation proposed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und Draft, which stipulated the legal bases and purposes of creating the fund and also regulates the fund's sources of funding. Although the idea of the draft is goo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oubts and questions concerning its contents. Since certain states in the U.S. already have enacted such split-recovery statutes through carrying out the method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 purposes of the funds mentioned above, this thesis, therefore, examines the sharing system of U.S. public policy, its practical concerns, and its relevant decisions challenged by constitutionality. Especiall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decision for the case of 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 by the Supreme Court in 2007 and scholarly concerns and studies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system. Finally, it tak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se systems as a reference to provide a resource for Taiwan's future legislative referenc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Providence University; Ph.D. in Law,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Taiwan.

Received: October 5, 2013; accepted: February 20, 2014

一〇四年三月

美國法上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之研究 85

Keywords: Compensatory Damages, Punitive Damages, Split-recovery Statute, Consumer Protection Fund, Takings Claus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Due Process Clause